

# 中评周刊



CHINA—REVIEW WEEKLY | 第 88 期 2018 年 11 月 23 日

## 中评周刊 | 第 88 期目录

### 专题 | 审查监控制度，从未离开中国

1. **朱达志**: 今天他们敢盘查学生的手机电脑，明天会不会出现严凤英式的开膛破肚? P. 2
2. **欧阳晨雨**: 清查师生电脑手机，红头文件有没有越权? P. 7
3. **李勤余**: 广西一高校要求全面清查师生电脑手机，法治建设岂容“开倒车” P. 10
4. **网文**: 12 个“雪亮工程”，3.5 亿金额，竟然全部指定给一家公司? P. 12
5. **景凯旋**: 东欧的审查制度 P. 20
6. **Freedom House**: 2018 网络自由报告：数字极权主义的崛起 P. 33

### 观点文章

1. **盛洪**: 民企退场否定改革开放 40 年根基 P. 37
2. **张千帆**: 广州，请带头回归法治文明的底线 P. 43
3. **盛洪**: 小民生计，大国根基 P. 46

### 随笔散记

1. **许章润**: 私塾先生 P. 52
2. **李夏恩**: 孩子们，你们要听话! P. 55
3. **张郎郎**: 在死刑号的日子 P. 63

### 读书

- 贝蒂·约瑟夫**: “客体关系之母”梅兰妮·克莱茵的原生家庭与她的个人发展 P. 73

### 预告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P. 78

- 订阅** | 往期下载 P. 80

## 朱达志：今天他们敢盘查学生的手机电脑，明天会不会出现严凤英式的开膛破肚？

[朱达志 资深传媒人,新浪专栏观察家。本文首发于 2018-11-14 新浪微博, 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 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朱达志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居然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声称“全面清查教职员工和在校师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

昨天，该校党政办公室信息科陈姓工作人员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虽然学校保卫处蒋姓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该文件中的内容还没有具体落实。但是制作下发这种无法无天的文件本身，就已经涉嫌违法了。

如此这般毫无法律依据地全面清查教师和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电子设备，我真想不明白今夕何夕身处何地。这是 21 世纪改革开放已 40 年的中国吗？

如图所见，该“通知”第一条即所谓清查清理工作范围及内容：“各单位、学院要对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 盘等存储介质进行全面清查”。

这样的通知，不被质疑才是天大的怪事。面对网民指责和媒体的介入，该校负责具体审批、落实这项清查工作的保卫处蒋姓工作人员称，现在学校相关部门领导正在研究对该文件要不要修改，考虑到清查学生手机涉及隐私等问题，“清查的范围可能会减少”。

不知道蒋先生所谓“清查范围减少”是什么意思。学校无法依据清查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存有私人信息的电子设备，无论范围多大多小，都改变不了它的非法性质。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桂电〔2018〕77号

## 关于开展清理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禁、 违法音视频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近期，境内外敌对势力通过网络、手机等途径，大肆传播违禁、违法影像视频。为抵制和打击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有害思想的传播，按照学校的安排部署，现将各单位、学院开展清理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禁、违法音视频工作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 一、清查、清理工作范围及内容：

（一）各单位、学院要对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 盘等存储介质进行全面清查。

- 1 -

（二）清查、清理的主要内容为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禁、违法音视频。

### 二、清查时间：

2018 年 11 月 7 日至 11 月 23 日

### 三、具体工作要求：

（一）各单位、学院要高度重视，机关单位要成立以处（部）长为组长的违禁音视频清查小组，学院要成立以党政一把手为组长，分管学工和实验室、办公室等工作的学院领导为副组长组成

很多人将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上述行为，仅仅理解为侵犯学生隐私。其实，这完全是一种 W 革式的无法无天。今天他们敢全面清查教职员工和学生的私人通讯设备，如果没有遭遇抵抗，那么明天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限制任何人的人身自由。

当年，纳粹对犹太人就是那样搞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想对自己的人也如此为之吗？当年，斯大林对政敌也是那样搞的；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要以全校教职员和学生为敌吗？



**严凤英** [1930.4.13—1968.4.8]

中国卓越的、极具天赋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戏曲剧作家、编曲家，戏剧教育家，是拯救了已衰败的黄梅戏这一地方剧种的大师，集编剧、唱腔设计、导演、表演于一身的创作的集大成者，历任安徽安庆市黄梅戏学院名誉院长、国家一级编导，中国文联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她主演的《牛郎织女》《天仙配》《女驸马》等剧目已成为不朽的经典，并发展和缔造了黄梅戏迄今无人超越的成就，尚处于艺术巅峰的戏剧大师严凤英却惨死于文革，年仅 37 岁



**刘海粟题字的严凤英墓**

2018 年是严凤英罹难 50 周年祭，当年猥亵、残害严凤英的凶手、“告密者”、及在场“见死不救”的旁观者却可安然地颐养天年，是民族文化的悲剧、也是文革迫害文化名人的历史耻辱标记

今天可以清查全校人员的手机电脑，明天，像当年黄梅戏名角严凤英女士那样被开膛破肚找“特务工具”（发报机）之类骇人听闻的惨剧，真的难保不会重演。

如果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上述做法不被制止，如果有关方面不追究决策者的政治和法律责任，那么当年那种血雨腥风式的 W 革重来，就绝不会是耸人听闻。

真没有耸人听闻。那次 W 革发生前，谁也不会相信未来十年中国大地上会有那么多无辜的人遭遇那么野蛮的摧残和迫害。



德国反纳粹独裁电影《浪潮》剧照，影片根据 Todd Strasser 同名小说改编自 1967 年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起真实事件，一位高中历史教师以体验教学方式，在学生中进行的一场模拟纳粹党徒施行极权运动的社会学实验



影片《浪潮》证实了极权统治“洗脑”于无形的过程和极权暴力与普通人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及“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如何在现实中成为可能”；

影片借真实事件隐喻了“法西斯、纳粹独裁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遥远”。

该片于 2008 年在德国首映

更可怕的是，校方那样做，无疑是在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培养他们的乌合之众人格和法西斯主义世界观。就像德国电影《浪潮》所表现的那样：只需要 5 天的“培训”，就可以速成一班小纳粹来。

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大局来之不易。面对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上述做法，有关方面必须当头棒喝并严厉追究责任。否则，就是对历史、对国家、对国人的犯罪！

[【返回目录】](#)

## 欧阳晨雨：清查师生电脑手机，红头文件有没有越权？

[ 欧阳晨雨 法律学者。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附录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对于这些违法违规音视频，究竟由谁来清理，如何来清理，还得有点法律意识，遵守法规程序，不能信马由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下发了一份通知文件，涉及“全面清查在校师生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内容，引发网络热议。

不妨细看一下惹来“指责”的红头文件。在这份标题为《关于开展清理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禁、违法音视频工作的通知》中，第一条就指出此项清查、清理工作的范围及内容，“各单位、学院要对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存储介质进行全面清查”，时间为“11月7日至11月23日”。

该校工作人员证实了这则文件的真实性，但回应称文件中的内容还没有具体落实。广西教育厅向媒体表示，已关注此事，正在跟踪事件进展。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清理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禁、违法音视频，维护校园秩序安定，营造良好氛围，的确很有必要。问题是，对于这些违法违规音视频，究竟由谁来清理，如何来清理，还得有点法律意识，遵守法规程序，不能信马由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按照法律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

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而且，保护隐私，尊重隐私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我国民法、行政法、刑法均明确保护公民隐私权，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

在全体教职员、在校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 盘等存储介质中，不仅有他们的通信秘密，也有个人隐私。如果这份红头文件被执行，将涉嫌侵犯公民的个人隐私和通信秘密。此外，教职员和学生有通信自由。所谓通信自由，一是使用通信工具的自由，二是通信话语的自由，三是通信时间的自由。定下目标、时间、范围的清理活动，很难避免对个人生活造成干扰。

为了平衡保护公众利益与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宪法和法律中明确了检查和搜查的主体、程序、范围、对象等条件，排除了其他任何组织与个人以任何理由的介入。学校并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可以侵犯他人的隐私权、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

诚然，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 盘等存储介质，的确是违规违禁音视频的“重灾区”，但是如何才能有效清理，却要依法依规。另外，还要跳出手机电脑的“窠臼”，在思想教育、内网规范、日常管理、预警预防等方面“精耕细作”，如此才能真正起到治理不法音视频、净化校园文化的效果。

当然，治理不法音视频，也不是学校一家的事情。对于职能部门，需要认真抓好源头执法，加强网络等信息传播渠道监管，及时查处违法的人和事。对学校存在的非法音视频泛滥等问题，有关部门应当与高校展开联手治理，在最大限度保护教职员、学生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依法打击违法活动。至于发红头文件清查师生电脑手机，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该不该执行，有关方面应当有所反思，作出更正确的选择。

### 附录：综合自微博网友评论



该校学生林茗(化名)也向澎湃新闻表示,自己是在桂电的一个网络群里看到的这个文件,学校确实还没有开始这项清查。

《通知》的内容是否涉嫌侵犯隐私?

这份《通知》的内容是否涉嫌侵犯隐私?学校又是否有权清查在校师生的私人电子设备?

上海天安涌道律师事务所郭维朝律师指出,该文件中的清查“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他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中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张新年律师也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手机、电脑、硬盘、U盘等通信工具和存储介质中不仅有学生的个人隐私,也有通信秘密。隐私权和通信权不仅受民法、行政法保护,也受刑法特别保护。”如果这份文件属实,则校方及有关人员显然欠缺法治思维,并涉嫌严重违法,应予问责。退一步讲,即便有学生涉嫌犯罪,也只能由法定主体依照严格的法定程序进行通信检查,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学生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他同时表示,“即便是在中、小学校限制行为能力或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隐私,也应依法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

[【返回目录】](#)

## 李勤余：广西一高校要求全面清查师生电脑手机 法治建设岂容“开倒车”

[李勤余 特约评论员。本文转载自 2018-11-14 央视网]



近日，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下发的一份涉及“全面清查在校师生手机、电脑、移动硬盘”等内容的通知文件引发网络热议。据相关网传截图显示，这份标记为“桂电【2018】77号”的文件标题为《关于开展清理涉暴、涉恐、反动、淫秽等违禁、违法音视频工作的通知》在第一条中就指出，此项清查、清理工作的范围及内容为：“各单位、学院要对全体教职员工、在校学生的手机、电脑、移动硬盘、U盘等存储介质进行全面清查”。

这份通知之所以引起网友的广泛关注，和其内容突破了公众的认知不无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因此，所谓“清查”明显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这实在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法律事实。哪怕不具备多么深厚的专业知识，大多数人对隐私权这一概念也并不陌生。因此，桂林电子科技大学的这份通知就显得格外突兀了。在这个人人懂法、人人讲法的新时代，一条公然践踏法律尊严的通知受到公众的批评，可以说不足为奇。奇怪的倒是，校方竟能理直气壮地提出不正当的要求，还打算以通知的形式强行实施。不知相关决策者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

让人担忧的是，高校是社会的象牙塔，是培养建设祖国人才的宝地。法治教育应该是所有高校学

子不能缺席的一课。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开启了新时代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更是从历史与逻辑两大维度，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的当下，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本应积极响应，进一步落实相关工作，可现实情况却让人大跌眼镜。试想，一所不具备法治思维的高校，又怎可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呢？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发布通知的初衷，或许是积极清理有害信息，这本无可厚非。但缺乏程序正义的工作方法，不可能达到结果正义的工作目的。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该校负责具体审批、落实这项清查的学校保卫处蒋姓工作人员称，目前该文件中的内容还没有具体落实。“现在学校相关部门的几位领导正在研究商量对这个文件还要不要改，可能考虑到清查学生手机涉及到隐私等问题，清查的范围可能会减少。”值得注意的是，校方只是在商讨文件是否需要修改，并未认识到通知引起争议的根本原因。校方的当务之急，是反省自身，尽快补上法治教育这一课。如若不然，纵使此番通知迫于舆论压力而叫停，下一回，还会有更“奇葩”的通知诞生。

网友对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通知的抗议和反弹，也从侧面说明，法治意识早已深入人心。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此事所引起的风波也证明了我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在中国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大幅提升的当下，人民群众对司法领域公平正义的获得感明显增强。正因如此，任何在法治建设方面开倒车的行为注定是不得人心、不合时宜的。需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绝不止是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返回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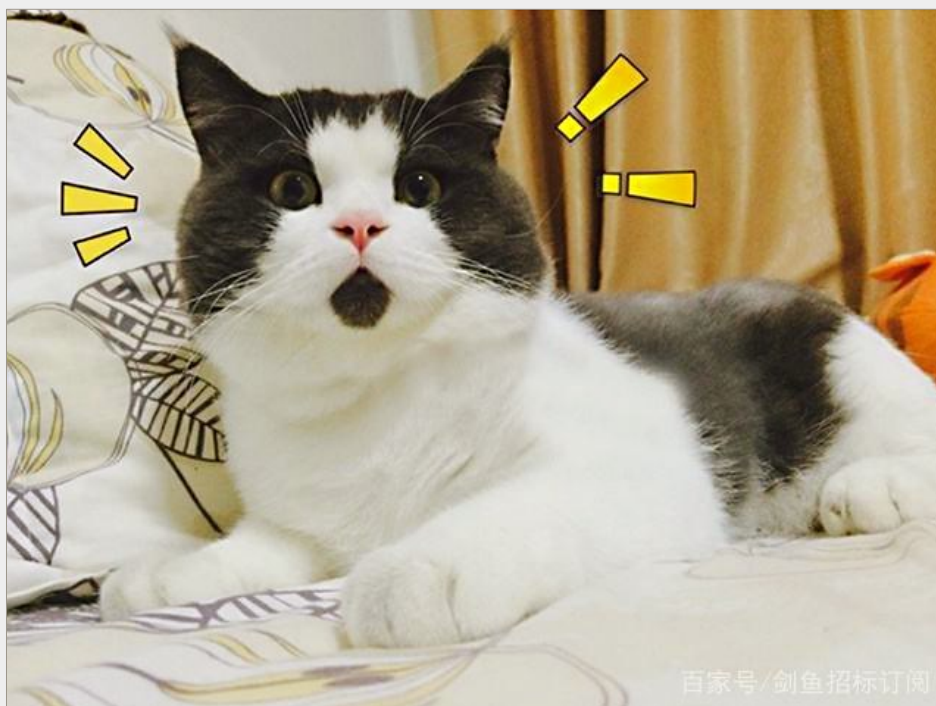
## 网文：12 个雪亮工程，3.5 亿金额，竟然全部指定给一家公司？

[ 本文转载自网络。附录参考图表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甲方直接指定中标人，你只是听说过，没有真正见过吧？

在贵州，就有一家这样牛 B 的企业。

它在一年之内，总共投了 12 个标，结果 12 个标居然全部中了。



这还不算牛 B 的，牛 B 的是这只是它的副业，不是主业。这就让人汗颜了，副业搞得这么好，那主业不是得好上天啊？

然而并不是，这家公司是“贵州省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贵州广电）。做过大客户销售的人都知道，他们主业只是做广播电视网络建设，是很传统的业务。

截止到今天，贵州整个省总共只有 12 个“雪亮工程”项目，总金额达到了惊人的 3.5 亿元之巨，而这所有的项目，竟然都被指定给了贵州广电中标。

12 个项目中，有 9 个采用了单一来源采购，1 个采用了竞争性磋商，2 个采用了公开招标。

大家都知道，采用单一来源采购，实质上就是指定中标供应商；采用竞争性磋商，也是安排好的公司来进行磋商，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意外。复杂度最高的是公开招标，但也无妨，安排好配合围标的公司也不影响招标结果。

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姿势招标，贵州广电总是能中标，项目成功率 100%，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是投标界飞机中的战斗机。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金额(万元)	中标供应商	时间	采购方式
1	印江县多彩贵州·美丽乡村雪亮工程	261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印江分公司	2017-10-25	单一来源
2	遵义市汇川区乡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雪亮工程”项目	1200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1-17	单一来源
3	河土家族自治县乡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雪亮工程”采购项目	1074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6-14	单一来源
4	石阡县“雪亮工程”服务采购	9860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石阡分公司	2018-6-26	单一来源
5	道真自治县四期“天网工程”暨“雪亮工程”租赁服务	10191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7-16	公开招标
6	遵义市新蒲新区乡村视频监控“雪亮工程”项目建设	2084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7-20	单一来源
7	务川自治县乡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雪亮工程”	700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7-26	单一来源
8	大方县公安局采购大方县“雪亮工程”信息服务项目	9553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大方分公司	2018-8-30	单一来源
9	平塘县“雪亮工程”建设及服务采购项目	1200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9-4	竞争性磋商
10	正安县乡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雪亮工程”项目	1417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9-26	单一来源
11	三都水族自治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雪亮工程”项目	2401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8-10-9	公开招标
12	都匀市乡村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雪亮工程”项目	919	贵州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单一来源
	总金额	34860			

贵州广电，平均每个月中标一个雪亮工程，平均每个项目金额 3000 万元，他们常年不是在投标，就是在投标的路上。100%的中标率，单项目 3000 万的骄人业绩，让那些屡投屡败、屡败屡投的公司，简直羡慕嫉妒恨啊。

100%的中标率是如何练就的呢？我们通过大方县“雪亮工程”信息服务项目，来学习一下贵州广电的各种神操作。

该项目采用单一来源采购，理由是：“雪亮工程”是广大老百姓参与的视频监控工程，监控过程是老百姓通过电视进行适时监控。目前，我县广播电视已全面进入广大老百姓家庭，且相比其他网络公司覆盖面广。

查了一下《政府采购法》单一来源采购的适用条件，发现这一理由并不符合以下三个条件之一：

1. 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
2. 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
3. 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

“相比其它网络公司覆盖面更广”，说明其它网络公司也可以覆盖，就证明可以从其它供应商处采购，“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条件就不成立了。

你看够牛 B 吧，为了指定中标人，不符合条件也是可以用单一来源采购的哦！

还有更牛 B 的操作，为了让理由更充分，三位专家出场了，分别来自：大方县中医医院、大方县住建局、业主代表。

可是，专家论证意见却很不走心呀，理由和结论出奇地一致，文字和标点符号都一字不差。这不明

摆着是打印好意见，签个名字走过场，顺带拿点专家费嘛。

### 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表

预算评审单位	大方财政局		
采购单位	大方公安局		
项目名称	大方县公安局采购大方县“雪亮工程”信息服务项目		
项目金额	大写: 玖仟伍佰伍拾叁万玖仟元整		小写: ¥9553.90 万元
专家论证意见	<p>根据毕节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毕节市公安局文件（毕综治办〔2018〕11号）关于开展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通知的相关要求，同时“雪亮工程”是民生工程，是群防群治工程，是广大老百姓参与的视频监控工程，监控过程是广大老百姓通过电视进行适时监控。目前，我县广播电视已全面进入广大老百姓家庭，且相比其他网络公司覆盖面广，基于以上原因建议大方县公安局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p>		
	专家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大方县中医院	

论证时间: 2018年8月24日

锁慧老司机

### 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表

预算评审单位	大方财政局		
采购单位	大方公安局		
项目名称	大方县公安局采购大方县“雪亮工程”信息服务项目		
项目金额	大写: 玖仟伍佰伍拾叁万玖仟元整		小写: ¥9553.90 万元
专家论证意见	<p>根据毕节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毕节市公安局文件（毕综治办〔2018〕11号）关于开展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通知的相关要求，同时“雪亮工程”是民生工程，是群防群治工程，是广大老百姓参与的视频监控工程，监控过程是广大老百姓通过电视进行适时监控。目前，我县广播电视已全面进入广大老百姓家庭，且相比其他网络公司覆盖面广，基于以上原因建议大方县公安局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p>		
	专家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大方县住建局	

论证时间: 2018年8月24日

以上还只是操作层面的牛 B 之处，再来看看这个项目本身有多牛吧。

这个项目的总金额达到 9553 万元，接近 1 个亿呀。大家看习惯了几个亿的豪单，1 个亿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给大家看两个数据，你就不会这么想了。

大方县 2017 年的 GDP 只有 200 个亿，一年财政收入只有不到 30 个亿。

**一个项目，支撑了一个县 GDP 的 1/200，花掉了一个县 3/100 的财政收入。**

大方县，也真够大方。

竞争性磋商，基本不用公开招投标。

这一两年，特别是今年，很多金额巨大的项目，都采用了看似公平公正公开的招标流程，实则标前甲方就已经指定了中标方。操作的手法也如出一辙，采用单一来源采购，偶尔用竞

**当然，像贵州广电这样，承包了贵州一年的“雪亮工程”，而且无论何种方式招标，总是能中标，项目成功率 100%，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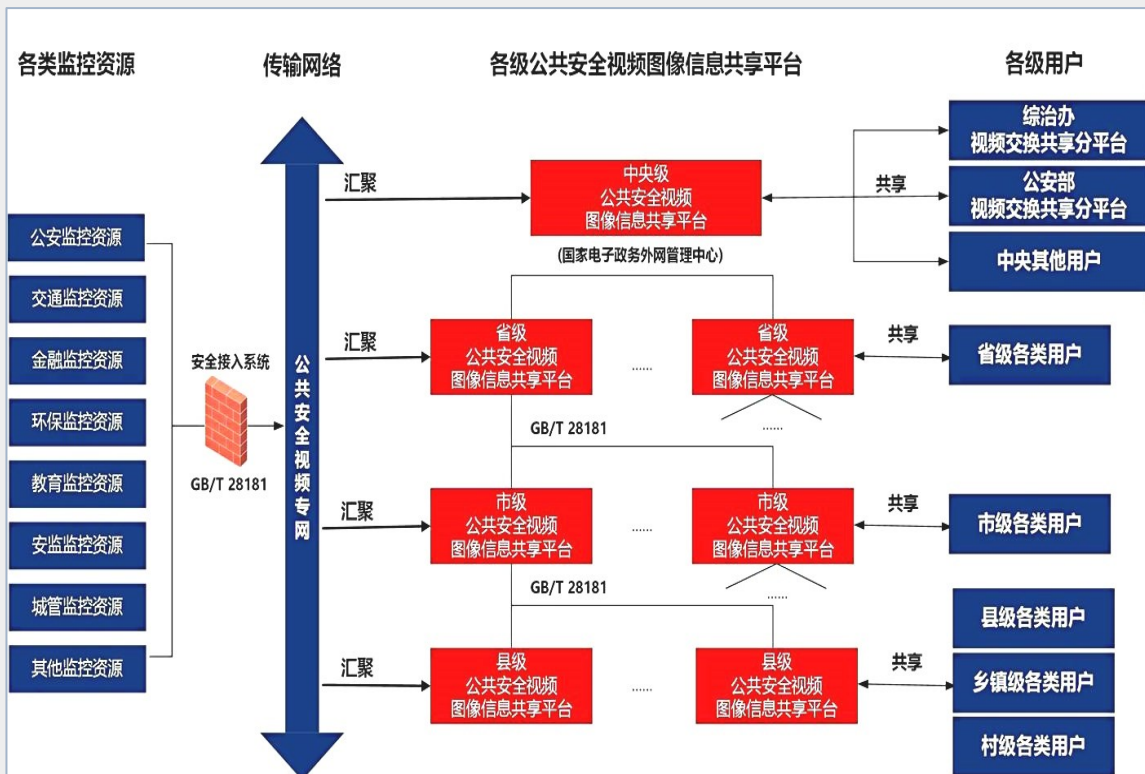
预算评审单位	大方财政局		
采购单位	大方公安局		
项目名称	大方县公安局采购大方县“雪亮工程”信息服务项目		
项目金额	大写: 玖仟伍佰伍拾叁万玖仟元整		小写: ¥9553.90 万元
专家论证意见	根据毕节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毕节市公安局文件（毕综治办〔2018〕11 号）关于开展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雪亮工程”建设工作通知的相关要求，同时“雪亮工程”是民生工程，是群防群治工程，是广大老百姓参与的视频监控工程，监控过程是广大老百姓通过电视进行适时监控。目前，我县广播电视已全面进入广大老百姓家庭，且相比其他网络公司覆盖面广，基于以上原因建议大方县公安局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		
	专家姓名		职称
	工作单位	业户方代表:	

论证时间: 2018年8月24日

这种玩法非常大胆，表面上看能隔绝风险，但我相信过几年，一定会有人出事。为什么？你们猜猜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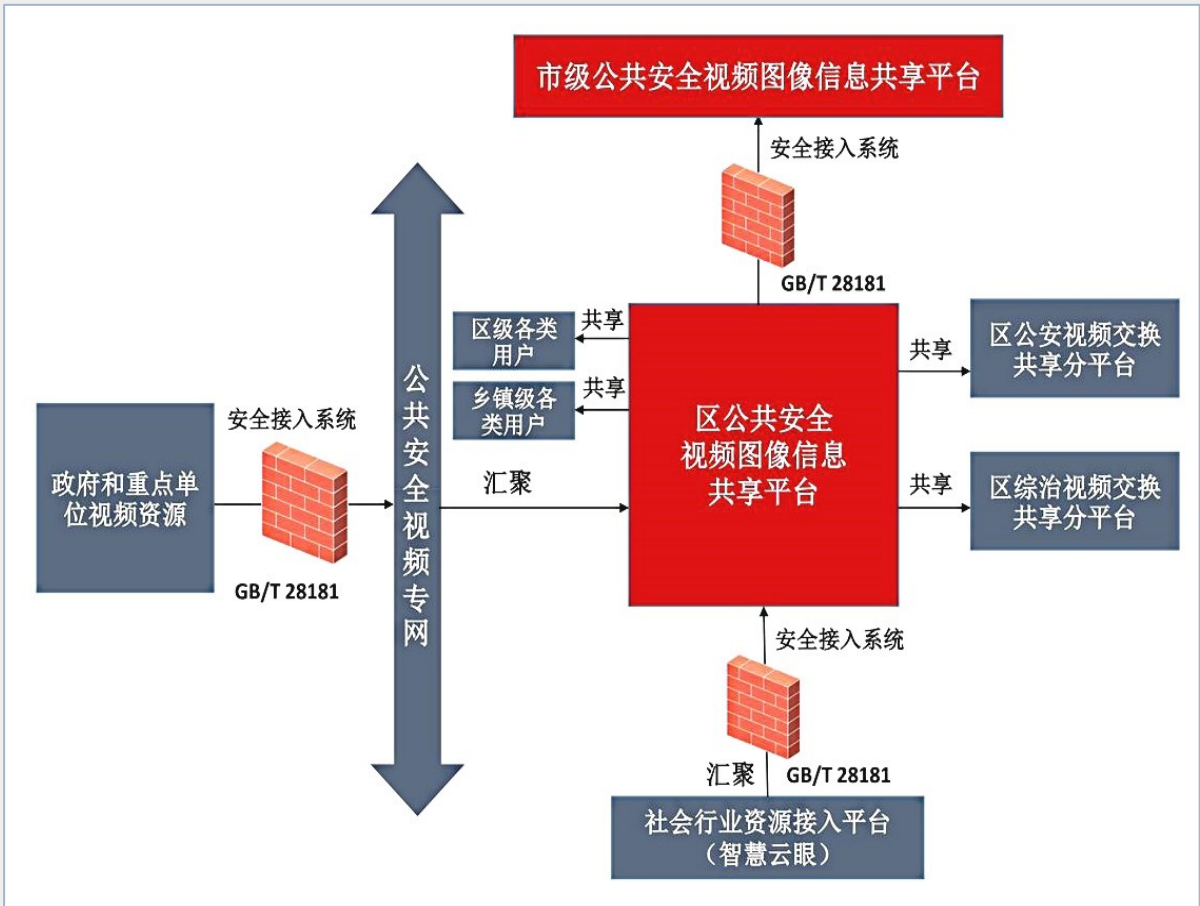
## 附录参考：“雪亮工程”的“全覆盖、无死角”相关资讯

资料来源：中国安防系统网站



雪亮工程总体架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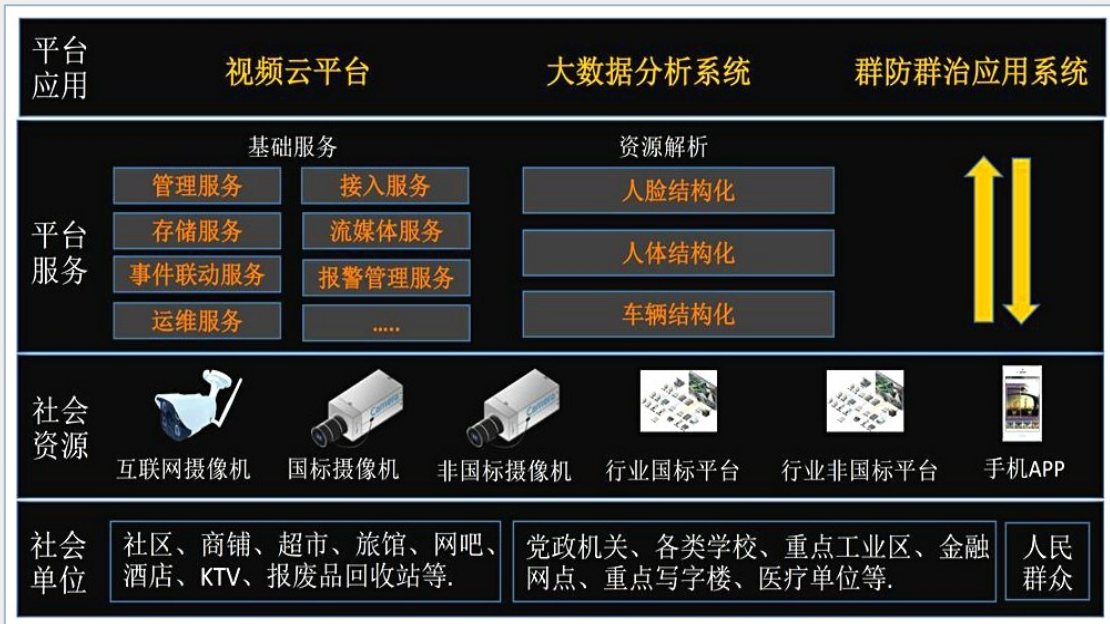




雪亮工程逻辑架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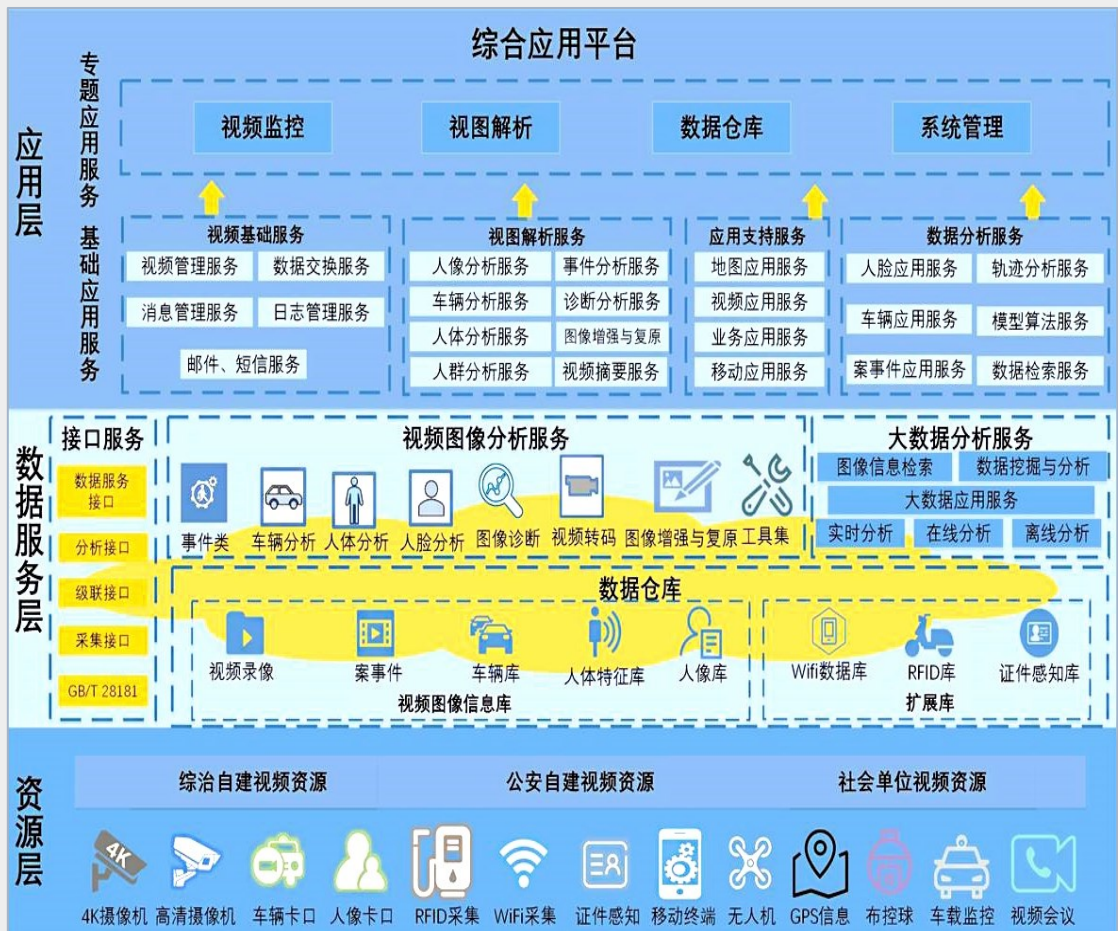
公共安全视频图像联网共享平台逻辑架构图



社会行业资源接入平台逻辑架构图



视频图像智能解析图



视频图像解析平台逻辑架构图



多维数据时空研判应用图

[【返回目录】](#)

## 景凯旋：东欧的审查制度

[景凯旋 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教授，专栏作家。译著有昆德拉的《玩笑》、《生活在别处》等作品；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我快乐的早晨》等。本文曾发表于2013年2月号《Lens》，此为原文]



本文作者景凯旋教授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这段话见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在1842年写下的名文。前东欧国家领导人对这句名言都应该十分熟悉，如同熟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论证了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的观点，并指出：“书报检查就是官方的批评。书报检查的标准就是批评的标准”。“整治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恶劣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

马克思的观点基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潮，那就是三百年前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所申言的，如果用防止人民了解恶来让他们选择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有意思的是，**普鲁士王国这一检查令同样源于这一思潮，它宣称：“根据这一法律，书报检查不得阻挠人们对真理作严肃和谦逊的探讨，不得使作者受到无理的约束，不得妨碍书籍在书市上自由流通。”**尽管它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思想的禁锢。正是在相对宽容的十九世纪，社会主义思想才得以传播开去，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促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二战结束后，东欧各国相继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模式建立在暴力和宣传的基础上，它的理论矛盾不比它的现实矛盾更少。一方面，鉴于言论自由已经取得普世的合法性，东欧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了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且其政府从来都否认审查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东欧国家的作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无所不在、令人窒息的审查制度。这个矛盾的现象集中体现了极权的本质，即迫使每个人生活在谎言中，对它的反抗因而成为二十世纪最具有人类精神史意义的现象。

## 一、黑皮书

1977年2月，一位波兰人乘船来到瑞典，此人名叫托马兹·斯捷维斯奇，是波兰新闻出版审查总局的工作人员。在他随身携带的塑料袋里，藏有一份长达六百页的有关审查制度的秘密文件。平安抵达瑞典后，斯捷维斯奇立即与波兰国内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取得联系，要求他们设法公布这份文件。不久，这份《波兰审查制度黑皮书》由波兰流亡者办的出版社在西方出版，并被旅游者悄悄带回国内。

所有看到这份文件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恐惧，这份爱德华·盖莱克统治时期的文件证实了政府对一切出版活动的严密控制，其中详细规定了审查的范围和程度，无论是国际新闻还是超现实主义诗人的隐喻，无论是经济统计还是讽刺漫画，甚至包括婚礼请柬、马戏团海报，都要受到一大群审查员的监督审查。下面是黑皮书中1974至1977年的审查指南，每个审查员每天都必须将其摆在桌上，熟记在心：

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前，不得发布投票人的数据。

在提及民主德国的首都时，应使用“柏林”一词，以区别于“西柏林”。

凡是在美国、外国或波兰观察到的美国两百周年纪念仪式、表演或其他活动的消息，必须由波兰新闻社（PAP）报道。源于其他方面的消息必须清除。

由波兰举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国际会议或演出活动，凡是有以色列代表参加，此消息应在新闻出版审查总局的指导下予以清除。

凡是赞成或宽容波兰的嬉皮士运动，没有严肃对待这一问题的出版物都必须禁止。只有明确执批评态度的出版物才可以公开。

**凡是因工业或农业上使用化学造成的对生命或健康的直接威胁，或是对波兰自然环境造成威胁的有关信息，都应当予以清除，并代之以环境保护工作的报道。**

不得发布全国酗酒人数上升的数据。相关数据只能在专业刊物上发表。

据悉，格但斯克第八十中学教室用于密封窗户的材料释放出有害物质，导致全校停课。此类事件绝对不得报道。

**不得报道波兰对苏联出口肉类的信息。此禁令完全是为了维护审查制度的权益。**

**所有宗教出版物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关宗教状况的批评，都必须删除。**

文件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方面的各种消息禁令，其目的是不让公众知道各方面的真相，以控制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防止公众对政府产生不满，从而维护政权的稳定。



**爱德华·盖莱克** [ Edward Gierek 1913—2001]

1970年12月接替因镇压罢工而下台的斯瓦夫·哥穆尔卡掌权，推行“波兰特色社会主义”以保持现行的权力垄断，对大众媒介实行官方审查和高压统治，但同时又希求经济变革，最终于1980年因失去民心而被迫下台

在这份文件中，还列有被禁作家的名单。其中就有诗人和学者巴兰察克，他翻译的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作品不能出版，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在黑名单中，但他从没有接到正式通知，解释其译作为何遭禁。正如巴兰察克所说，新闻出版审查总局“不仅是奥维尔的真理部，而且还是卡夫卡的《城堡》，从外部看去，它是自足的、封闭的。”**唯一了解实情的是审查员和他的上级，作者或者编辑都无权知道审查规则是如何运行的，即使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没有申诉的权利。**

**在审查制度的文化里，作者被迫过着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即使有时能公开发表一点真话，但由于预先考虑到要面对审查，作者的表述只好含糊不清，甚至夹杂着必要的谎言。**巴兰察克写道：“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这甚至甚至于审查官的红铅笔。”

**正如波兰诗人赫伯特所说：“说出真相是知识分子的基本义务，只有这样，社会的公正才会施予他**

们。”但在审查制度下，审查员的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它对任何问题都提供一个规定的答案，并把迫害的现实变成一种可以删除的信息，不是因为害怕它会引起公众的痛苦，而是因为它必须不存在。

有的作家为了让当局了解真实情况，就故意采取大胆暴露现实的写作方式。七十年代，波兰最具反抗精神的作家斯蒂凡·基谢莱夫斯基就是这样，他的作品总会因通不过审查而成为内部机密报告。这成为将信息传达给波兰领导人的唯一方式，作家希望，如果他们读了这些报告，也许会知道波兰正在走向灾难。

但这种方式并不奏效。正如巴兰察克所说，通常人们认为，极权国家的危机是由于当权者不了解真实的情形，为了防止异端思想，他们才实行严厉的审查制度，结果阻碍了资讯的流通，同时也将自己与现实隔绝开来。事实上，他们每天通过内参和审查报告，也多少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但这些信息对他们制定政策毫无影响。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中，“没有客观的真理，也没有客观的现实。只有统治者允许存在的事实和事物存在。”

按照波兰学者简·柯特的说法：“审查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得出的逻辑结论就像是后结构主义的原则，即现实只是一种按照一定规则可以任意改变的信息。”为此，巴兰察克指出，如果审查员删除了有关传染病的消息，那不是因为当局害怕引起民众恐慌，而是因为传染病本就不应当发生。他们就像是生活在一个虚幻世界的诗人，幻想着只要不允许公开报道经济衰退、环境污染和飞机失事，这些现象就会神奇般消失。而只要大众媒体、统计数字、流行歌曲都在歌颂一个繁荣、和谐、廉洁和安全的国家，他们的梦想就会成真。

对权力者来说，为了让自己继续做梦，审查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可悲的是，每一次新的领导人上台，做出一些开明姿态，都会使人们产生希望，开始讨论这些梦想者的“观点”、“个性”和“政策”，好象他们真的想了解现实，想了解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而实际上，他们的城堡一如既往地与世界隔绝。

## 二、自我审查

在东欧国家，人们对审查制度早已习以为常。巴兰察克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曾在华沙街头遇到一位从前的同学，这个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出版管理机构工作的机会。巴兰察克问他是不是想成为一名审查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审查别人的文字，这位同学幽默地回答说：“为什么不呢？”这种无所谓的态度使巴兰察克想到，假如他们争执起来，同学一定会用这样一个定论来使自己难以反驳：“如果我是一个编辑而不是一个审查员，我也一定会审阅你的文章，不是吗？那你们这些作家呢？不是也要自己审查自己的作品吗？”

这个细节说明，对当局来说，审查制度的最佳结果是导致自我审查。由于审查制度是如此普遍和寻常，以致人们已经难以察觉到其中的耻辱和荒谬。像这样的谈话不但会发生在华沙，也会发生在布

拉格、布达佩斯和东柏林的大街上和咖啡馆。**在每一次谈话过程中，审查员和作者都会很轻易地转换角色：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道德区分。**

1985年，正在国外的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收到一封国内寄来的航空信，上面盖着的邮戳上注明：此信发往欧洲。作家由此想到，这可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国家没有审查制度，也可能是为了表明这封信经过了审查。这个含义丰富的表示使人们得以了解审查制度的性质，当局既希望建立审查制度的合法性，又不愿承认审查制度的存在。

自从铁托在1948年与斯大林闹翻后，他在南斯拉夫实行了较为独立的外交政策，并赢得了西方的赞赏。但在国内，他却采用铁腕统治，压制一切反对的声音。在南斯拉夫，没有公开的审查机构。审查任务是由媒体负责人、编辑、评论员或专业校对来承担的，如果具有颠覆性的书籍或文章侥幸通过了审查，最后还有印刷工人把关，他们会出自工人阶级的觉悟拒绝印刷这些文字。

**审查制度的目的就是要曲解现实。**南斯拉夫作家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在介绍苏联学者罗曼·雷达里赫的《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斯大林主义》时，特地指出后者所提出的一个术语：**虚构主义**。在苏联、东欧国家，**虚构的历史取代了所有真实的历史，因为“对极权的渴望，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根本内驱力。然而，既然不可能控制精神世界，它于是就不遗余力摧毁一切精神生活，再用虚构的东西填补空白的精神世界，这样既可以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虚构的本身也成了奴役的工具。”**

这个制度不仅要求人民顺从，而且还要求人民参与制造谎言。为了表示当局严格遵守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当局最希望作者能够自我审查。多数时候，编辑会从善意的角度对作者予以劝告，表示为了作者的利益，最好删除某些章节或文字。如果还不能说服作者，他就会诉说自己的难处，他的命运取决于作者的自我审查，取决于作者对公众隐瞒审查制度，否则就会使他丢掉工作。

对一个作家来说，这种自我审查无异于阉割自身，因而是最为屈辱的事。契斯为此写道：

**无论你怎么看，审查制度都是一种病态的显示，一种慢性疾病症状，自我审查就是和它一起发展出来的。自我审查虽然看不见，但却存在，远离公众视线，深埋在精神最隐秘的地方，比审查制度更有效果。虽然审查和自我审查依靠同样的手段——威胁、恐惧、讹诈——但自我审查掩饰了强制性，或者说它至少没有暴露强制的运用。对审查制度的反抗是公开的，并且是危险的，因而是勇敢的行为；而反抗自我审查却是无名的、孤独的、没有证明的——这对合作者来说是羞愧和耻辱的源头。**

自我审查意味着要用他人的眼光来阅读自己的文字，这使你成为自己的法官。你变得比任何人更严格、更怀疑，因为你作为作者，知道审查员不能发现的东西——你那些最隐秘的、没有说出来的思想，你感觉你仍能字里行间读出。你把你自身所不具有的想象的审查能力赋予阅读，把文字所不具有的意义赋予文字。你追查你的思想到了荒谬的程度，达到令人眩晕的结果，在那里一切都是颠覆性的，甚至接近它都是危险的、毁灭性的。

最后的结果可以想象，如果作者要想出版作品，只能选择屈服；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能选择放

弃。但无论结果如何，他都是一个失败者。

**审查和自我审查不仅导致精神奴役，而且还毁掉了各民族千百年发展起来的语言。**许多词汇改变了原来的意思，比如自由、民主、幸福、人权等，都变成了无意义的虚构概念，成为大话、套话和空话。**罗曼·雷达里赫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语词的“功能性虚构”。语词与真实之间脱离了关系，人们失去了称呼事物真名的可能。**

当然也有作者通过隐讳曲折的表达，成功地躲过审查制度。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将观念转换为象征，将现实转换为隐喻。这种表达方式需要文学才华，需要文学性写作。在前苏联、东欧国家，文学成就往往高于其他领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契斯在其文章中提到苏联鲍利斯·皮利尼亚克、伊萨克·巴别尔的小说，以及曼德尔施塔姆、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指出这些作家、诗人都从反抗自我审查中获得了很好的文学效果。用契斯的话说，“这是一个痛苦和悲剧的胜利”。

但更多的情况却是，**由于不断进行自我审查，作家们处在多年的恐惧、审慎和耻辱中，思想不能自由飞翔，他们的才能越来越枯竭，越来越写不出作品。正如米哈耶罗·米哈耶罗夫所说：“意识形态在所有精神生活领域虚构的东西并不是要引导人从这一角度思考，而是要让人压根儿就不思考。”**而当艺术和宣传混为一谈时，作家的想象力终于达到了切斯拉夫·米沃什所称的“窄化”阶段。

要想从这种束缚中获得自由，除了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改革，还得战胜内心的恐惧，恢复真实的道德标准和语词定义。

### 三、天鹅绒监狱

上世纪六十年代，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国家陆续制定了新闻出版法，而匈牙利却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这并不说明，有了新闻出版法，就一定有了言论自由。正如洛克所说：“法律的责任并不在于保障见解的正确性，而在于保障国家和每个具体人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在西方各国，实行新闻法治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制定新闻出版法，主要是欧陆国家；一种是没有专门的新闻出版法，主要是英美等国。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国家并不针对言论本身设立审查制度。而在苏联、东欧国家，正如匈牙利作家康拉德所指出，审查制度乃是其体制内在的组成部分，是文学合法性和建设性的要素。**

在审查制度下，东欧文学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制造出大量的宣传品。艺术家们认识到，这个制度下唯一的自由就是参与的自由，要创作超越允许体制的艺术是不可能的。他可以努力超越，仿佛审查制度并不存在，但这得要冒作品不能出版的风险。因此，他常常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可以写的？什么是不可以写的？这不仅取决于国家的大政方针，而且还取决于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好恶。

在 1985 年召开的匈牙利作协大会上，一位著名作家终于站起来强烈呼吁，要求建立公开的审查制度。他要求政府设立一个审查机构，详细规定它的权力；要求制订明确的法律条文，如果作家越过了

界限，可以通过法院来起诉。他指出，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什么内容可以发表，什么内容不可以发表，标准从来都很模糊。控制言论的宣传部门总是滞后，编辑往往会抢最快时间处理稿件，但好不容易早上获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午就可能遭到谴责。好不容易出版的一本书，很快就可能遭到禁售。编辑和作者都不知道，在通过一篇文章或书籍时，哪个环节会出问题？作品的命运将会如何？自己会不会受到处罚？

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卡达尔上台掌权。为了恢复社会和谐，他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一起”口号，取代了过去“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同时，卡达尔政权还成立“专家政府”，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并试图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来保持权力垄断，就连反对者也把匈牙利称为“快乐的军营”。

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匈牙利艺术家在创作上要自由得多，出版界也要宽松得多。比如，在匈牙利可以出版在其他东欧国家遭禁的作品，可以写无关宏旨的个人私事。但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政治禁忌，最重要的创作戒律就是：艺术必须证明现实的合理。

编辑、审读可以自由裁量，但他的决定却只能根据上面的指示。事实上，真正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加强还是削弱了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媒体人为了生存都自动变成了审查人员：除了宣传官员、出版机构负责人、编辑和审读，连每一个诗人、小说家、电影导演、影视制作者，也都学会了严格的自我审查，不断删除作品中的敏感词，删除大段文字和镜头，加进一些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法和概念。编辑和作者都明白，要想公开发表作品，就得善于打擦边球，采用曲折的表达。但这样一来，思维与话语的完整性都遭到了损害，作品的意思往往与创作者的意图相左，变成言不及义的空话。**

呼吁建立公开的审查制度其实是个反讽，因为不公开的审查制度一直都存在。匈牙利作家米卡罗斯·哈拉兹提曾写了一部书《天鹅绒监狱》，描述和分析了这种“审查制度的文化”。他在书中假托一个官方御用作家的口气，论证创作者和审查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亲密的合作者。从前的审查制度假定创作者与审查官是天敌，新的审查制度却消除了这种对立。双方“相互拥抱”，共同创造了繁荣的文化生活。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艺术家们会越来越与国家利益趋于一致，成为“国家艺术家”，以至于根本不再需要公开的审查制度。

与从前的时代相比，审查制度有着质的区别。在资本主义社会，艺术家是独立的职业，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产品，忍受出版商的剥削，并且常常为了艺术而过着贫穷的日子。**在社会主义国家，艺术家由国家发放工资，不再需要为生计发愁。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可能会使市场经济学家们感到无法理解，但“国家艺术家”却会感到自豪，将此看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解放。当然，这是一种群体的解放，艺术家的任务是为权力提供解释，他失去的是个人的创作自由，但却获得了生活安定的补偿。由于艺术家已经把国家视为自己的家园，国家因此能够更容易地驯化艺术家。**

自由是艺术的必要条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承诺的一部分。从前的艺术家们相信，艺术与自

由是天然同盟。在专制压迫下，艺术家不可避免要奋起反抗，相信艺术只有在反抗权力时才会变得伟大。如今，这些艺术家们即使作为国家的雇员，仍然自恃为自由的信使，但**“如果艺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利益又由党来代表，那么艺术将不再被视为艺术家的专属领地。**许多艺术家仍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自由精神的胜利；可实际上，自由精神已被一劳永逸地废除了。反专制精神最终乃是一派无以为继的纯粹自负，而艺术却存活下来，甚至繁荣兴旺。”

审查制度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家干预的问题，它也不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令人反感，而是确保文艺创作更有效地发挥其正面作用。无论艺术家的作品是如何糟糕，只要他们牢记自己的国家雇员身份，服从上面的宣传指令，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出版，获得当局对其作品的宣传和奖赏，从而安享当局给予的地位和高薪。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再会谈论作家的自由，只会谈论作家的责任，而这样的责任是和待遇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们既能享受为人民服务的合法的自豪，又能享受优越的特权：

**如果你去偷听任何一个为知识分子保留的匈牙利乡村别墅里艺术家和作家们茶聚时的谈话，或一次官方会议后高官艺术家们的攀谈，你将会极惊讶地听到他们彼此在诉说体制内的“不幸遭遇”时所流露出的满足。**

在许多官方艺术家眼里，这是一种“进步的审查制度”，他们意识到对国家有益就是对自己有益，因此他们宁愿受到权力保护而不是拥有创作自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匈牙利政府曾试图倡导大众文化，把艺术品推向市场，由于大众文化没有“价值”或“教育意义”，不足以保证国家的支持，因而必须自负盈亏，并交纳特别的税。结果引起许多官方艺术家的抗议，他们抗议被社会主义解放的艺术再度成为商品，他们批评个人利益、物质主义和公共事务中的不负责任，担心下放权力和采用金钱标准会造成一种新的、更难管理的文化环境，并且危及自己的崇高地位和稳定收入。

官方满意地注意到，对大众文化的担忧会大大减弱反对审查制度的观点。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从来不会仅仅受经济原因驱使，即使是在其推行经济现代化时期。让艺术家们在市场中仍得到保护的政府如今被看作是美学的保护者，是堕落的大众文化的反对者；审查制度得到热烈拥护，因为它是稳定的价值和建设性意见的担保者。

所有这一切都会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带来后果。他的思想、感情和情绪都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实际情况是，早期革命的艺术学家们还得从旧社会独立知识分子的作品中获得斗争所需要的激情，现在似乎已没有人对这一事实过分沮丧。如今只有在蜡像博物馆里还能找见独立艺术家的形象，紧挨着组织起来的工人的蜡像。独立的艺术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独立的受众。**我们生活在一个将反专制的艺术公然谴责为是反艺术的社会。**

那些持异议的、拒绝自我审查的艺术家都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会被贬低为一个政治抗议者，其作品则被看成只是为了表达政治不满。这样，他们就可以成为被谴责的对象。由于拒绝合作，他们的作品不会被允许出版，其本人也不会被承认为艺术家，他们只会被排除在艺术王国之外。对他们的羞辱

是对“国家艺术家”的奖赏。当然，他们的作品也不会被完全浪费：

他们像花园里的残败花朵一样，成为肥料。国家文化可以得到这些肥沃异议的滋养。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审美发现，就像我们对待西方艺术家们的试验一样。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引进他们的主题。我们可以从他们不受欢迎的自负中产生“有价值的”、“有机的”创新。他们用自己勇敢的自我毁灭行为促进了社会融合。国家越是机智灵活，就越能愉快地吸取异议者的精华，为国家文化的有机体所用。

正如匈牙利著名作家康拉德所说，哈拉兹提此书是一部探讨“审查美学”的书，是“揭露统治者内心秘密的地下文学”。审查制度产生于体制内部，已经成为一种生命的血液，缺少了它，什么都别想生存成长。“哈拉兹蒂的讽刺里蕴含了一个几近残酷的图景：如果国家社会主义真的成为了世界文明，那么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而波兰作家巴兰察克在评论此书时也指出，就像奥维尔曾经所恐惧的，在东欧极权制度下，确实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希望得到自由的人类品种”。

#### 四、萨米亚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东欧各国的出版界都产生了一种“萨米亚特”现象。这个词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1965年，前苏联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官方迅即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判以重刑，作为一种抗议，大量的手稿、打字稿冲破检查制度的封锁，广为传播，很快成为前苏联社会一种充满活力的、非官方的文化现象。

萨米亚特的实质就是突破审查制度，突破谎言世界的包围。前苏联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等人，都曾是萨米亚特的主要参与者。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在他的名文《莫要靠谎言过日子》中，首先就提到人们在撰写和阅读地下出版物。他的许多著名小说和文章都是通过地下出版而流传的。

在匈牙利的审查制度下，哈拉兹提的《天鹅绒监狱》同样不可能正式出版，而只能成为康拉德所说的“地下文学”。七十年代初，当哈拉兹提还是一个大学生时，就因为思想自由而被大学开除，去工厂劳动了一年，此后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一部书《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以萨米亚特的形式出版。为此他遭到逮捕和审判，被禁止在公开场合发表任何文字。此事在当时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就像捷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波兰的亚当·米奇尼克一样，哈拉兹提成为反抗和道德勇气的标志，代表着匈牙利最有独立性的异议者。

哈拉兹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当局的不断冲突中度过的。八十年代，他成为匈牙利第一份萨米亚特杂志《讲述者》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参与此事的还有作家康拉德和学者杰诺斯·基什等人，后者并联合其他作家、学者在《讲述者》上发表了《新社会契约》一文，呼吁匈牙利当局进行彻底改革，促进广泛的社会转型，包括市场经济、政治多元、民主选举和尊重人权和法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www.vcg.com

匈牙利前秘密警察总部

波兰的萨米亚特则是始于七十年代中期。1976年，在波兰城市拉多姆和乌尔苏斯爆发了工人罢工，知识分子首次介入工人运动，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同时诞生了波兰第一份萨米亚特刊物《记录》，政治学家米奇尼克是其中的重要撰稿人，其提倡改革新思路的著名文章《新演进》便是发表在《记录》上。波兰最著名的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也担任了杂志编辑，并时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在这份杂志上，人们还常常读到流亡国外的诗人米沃什的诗歌和散文，国内青年诗人扎加朱斯基的诗歌，哲学家柯拉柯夫斯基的论文。为此，米奇尼克等人经常遭到逮捕和审判。

东欧各国中，捷克斯洛伐克的萨米亚特最为发达，这要归于这个国家一批杰出的作家们，在面对极权淫威时，他们表现出了罕见的道德勇气和良知。发生于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一场争取改革的民主运动，提倡“人道的社会主义”，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力军便是作家。在运动最为紧张的时刻，由作家瓦楚里克执笔，并由众多作家、学者签署的《两字词》宣言，发表在《文学报》上，迅即成为“布拉格之春”的象征。

**这场民主运动最终遭到苏联军队的镇压，在“遗忘总统”胡萨克的严厉统治下，开始了所谓“正常化”时期。许多作家失去工作，沦落到底层社会，他们过去的作品遭到禁止，新的作品也不能出版，仅在1982年七七宪章开列的名单中，被禁止发表作品的捷克作家就有231名！七十年代初，一个被禁作家的小圈子开始每月一次在克里玛家里聚会，互相朗读他们的作品。他们中有捷克斯洛伐克文学的重要人物哈维尔、克里玛、瓦楚里克、格鲁萨、科赫特、克莱门特和乌德等人。**



**伊凡·克里玛** [ Ivan Klima 1931— ] 捷克籍犹太裔作家

瓦楚利克在回忆录《施瓦森堡的挂锁》中描述了“萨米亚特”文学的产生。最初，克里玛为了省钱，将自己的作品《麻疯患者》打成好几份，卖给那些感兴趣的地下读书会。瓦楚克里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文化事业的开始，他主动承担起编辑的任务，请人把作家们的手稿打出来，装订成书，并编上号码，然后再按照纸张、打字和装订的成本价，出售给作者本人和那些感兴趣的读者。瓦楚利克还给这种未经许可的丛书取了个隐喻的名字：“挂锁”。他甚至还请国营印刷厂工人来装订成册，配上被禁画家的插图，使它显得像真书一样。

作家克里玛在接受访谈中也谈到了萨米亚特的发展，他回忆道：“不久，其他的人也仿效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墨守成规的天主教徒，还有爵士音乐、流行音乐和民俗音乐的拥护者，以及拒绝由官方出版作品的年轻作家。”写作的范围也从文学扩大到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除了文学性的“挂锁”，还有其他萨米亚特组织，如“科瓦特”、“埃第斯·爱克思皮第斯”等。这些作者相互之间原来并不认识，都是通过萨米亚特才认识的，他们的组织者还经常互相交换书籍。

对于“挂锁”的使命和作用，瓦楚里克的评价是这样的：

最初，它被定位为帮助保存书稿的一种手段：保护和宣传它们，告诉那些感兴趣的圈子，尤其是专家们，让他们了解著名作家的新作以及崭露头角的才俊的新作。从这些方面来说，“挂锁”有别于“科瓦特”和“埃第斯·爱克思皮第斯”，就我所知，后两者只为某一特殊读者群服务，并且有他们自己特殊的“出版政策”。“挂锁”为未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提供了资料，而不仅仅是它的文学。它也为未来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收集资料。当事情有转机时，也为正常的出版贡献绵薄之力。但最重要的是，

“挂锁”给作者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交付日期，更不用说使他们与批评家、读者建立起某种联系形式。而可以想象它最有价值的贡献是（我从一开始就未怀疑过），它会让我们的作者在外国得到名声，引起捷克和外国出版商的注意。



捷克作家瓦楚利克（中）、剧作家哈维尔（左）和小说家帕维尔·科胡特

正如捷克学者米兰·塞梅切卡所说：“政府和意识形态尽力强加于我一个我并不认同的现实，并且声称我的现实是歪曲的，错误的，虚假的，而唯独他们的才是客观的，是经由全部历史以及政府机构官员决议所核准的。”在严厉的审查制度下，萨米亚特成为说出真相的唯一途径。这些作家提出的主张是“生活在真实中”，用以反抗生活在谎言中的现实，萨米亚特正是他们践行自己主张的最好证明。

由于萨米亚特绕过了审查制度，因此被官方认定为非法行为，为了避免被抓住和被没收的危险，这些作品都是在夜幕下的小房子里打出来的，藏在阁楼、天花板和花棚里，但作者、打字员和装订者仍会时时面临警察的搜查、审问和监禁。有一次，当局在搜查中甚至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老诗人塞弗尔特的打字作品《皮卡迪利的伞》，瓦楚里克把这部书的正式出版物拿到法庭，以证明塞弗尔特的作品是完全不应该被没收的，对此检察官只是说道：“印刷品是允许的，但这个打字本”。最终，当局没有归还这本书。

七十年代中期，“萨米亚特”作品开始流传到国外，官方加紧了控制，并且软硬兼施，许诺说只要放弃“萨米亚特”写作，作家们就可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当然，大多数作家没有顺从。在他们看来，出版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精神生产是人间的法律无权干预的。瓦楚利克回忆到，有一次，国外的一个

出版家协会奖给他一万马克（后来证明是误传），警察很快就知道了，询问他是否成立了一个出版社，他争辩说，“萨米亚特”不是一个出版社，而是沉默作家的一个维权行为。

官方对萨米亚特的攻击有时不是直接针对作者，而是针对打字员、装订工和组织者。这些打字员大多是些女性，有些还是家庭妇女，她们不仅承担繁重的打字任务，而且还主动搜集地下作品的情况，把它们提供给组织者和编辑。这些打字员承担的风险丝毫不比作者和编辑少。例如，一位叫塞诺格罗娃的打字员，因为抄写特瑞福卡和瓦楚里克的作品而被控有罪，幸好后来被法庭驳回，才免于牢狱之灾。

所有这些压制萨米亚特的行为不过是表现出当局的愚蠢和蛮横，而且看上去无济于事。在西方，有一句古老的拉丁文皈依格言：“谁统治，谁的宗教就是真理。”瓦楚里克把它改写为“谁统治，谁的愚蠢就是真理。”然而，愚蠢是不可能永远成为真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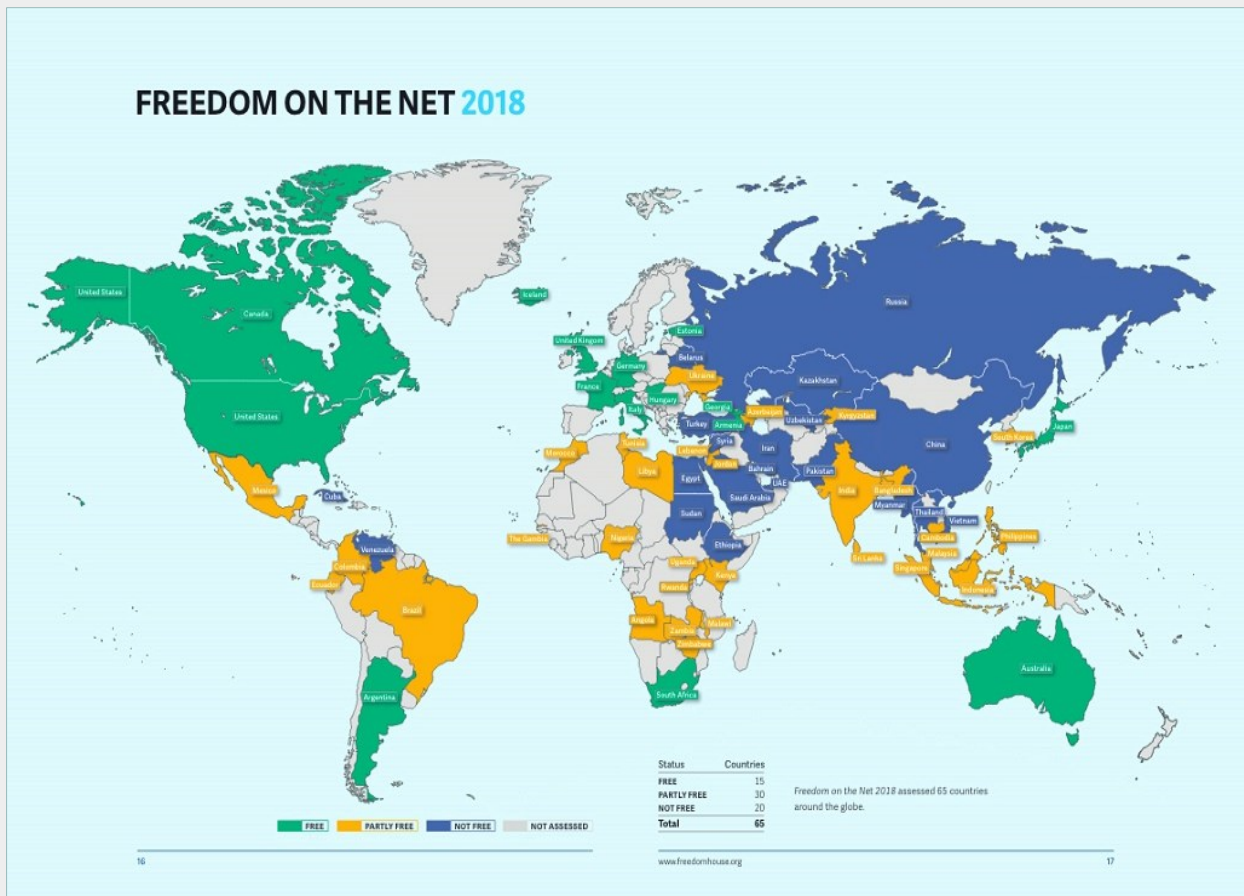
1989年，东欧各国相继实现了制度转型。萨米亚特在这场转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在新的民主社会，审查制度理所当然被彻底废除，人们终于可以自由地写作，实现三百年前弥尔顿的宣言：“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自由”。

[【返回目录】](#)

## Freedom House: 2018 网络自由报告：数字极权主义的崛起

[ 本文转载自 freedomhouse.org，图表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

《2018 网络自由报告》指出，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加紧对公民数据的管控，并使用“假新闻”的指控打压不同意见。这些作为侵蚀了民众对互联网以及民主体制基础的信任。自由之家一年一度发布的这份最新报告是按国别进行的网络自由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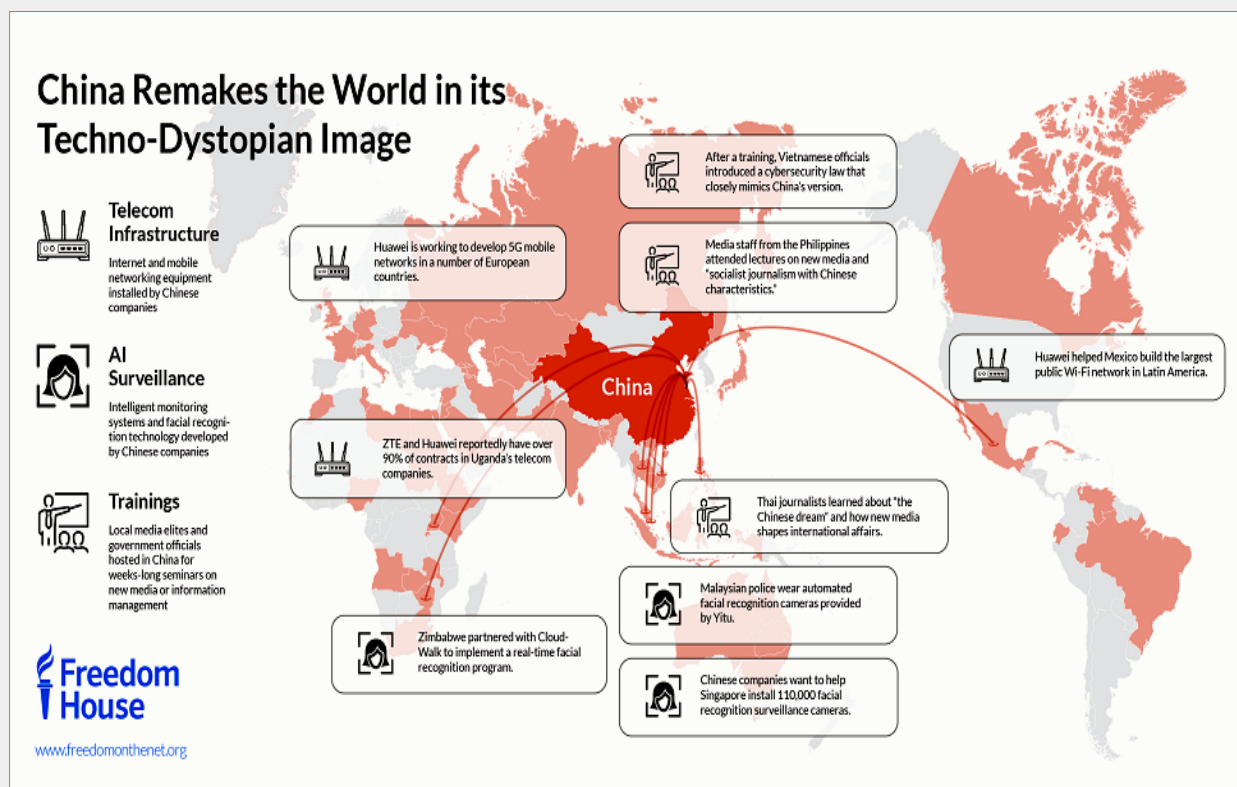
■ 绿色为自由， ■ 黄色为部分自由， ■ 紫色为不自由  
资料来源：Freedom House 2018 年发布的网络自由调查报告

网络宣传和虚假信息日益毒害着网络环境，而肆无忌惮地搜集个人数据正在破坏传统的隐私概念。与此同时，中国在管控国内网络方面已经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和驾轻就熟，并将它的管控技术输出到其他国家。

这些趋势导致全球网络自由在 2018 年连续第八年下降。

“民主国家正在数字时代苦苦挣扎，而中国正在国内外应用和输出它的言论审查和监控模式，”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艾博拉莫威茨 (Michael J. Abramowitz) 说。“这种模式对开放的网络造成了威胁，并且危及全球民主化前景。”

“美国政府和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在防范网络操纵和保护用户数据方面需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艾博拉莫威茨说。“当前，一些不那么民主的政府一直在利用网络系统的弱点，希望加强他们对网络的控制”。



China 把数字极权主义推向世界 示意图  
资料来源：Freedom House 2018 年发布

《2018 网络自由报告》评估了 65 个国家的网络自由，涵盖了全球 87% 的网络用户。这份报告聚焦于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5 月之间出现的新动向，也包含了一些最近发生的事件。中国再次在网络自由方面名列末位。

在这个评估年度，北京采取种种措施重塑了自己“科技恶邦”形象。在《网络自由报告》评估的 65 个国家中，中国官员针对新媒体和信息管理，为其中 36 个国家的代表举办了培训班和研讨会。中国还向外国政府提供电信和监控设备，并要求跨国公司遵守它的网络内容规定，甚至当这些公司在中国境外运营的时候也要遵循这些规定。

在中国境内，2017 年 10 月中共“十九大”之前几个月和 2018 年 3 月“两会”前后，中国加强了言论审查。在此期间，中国宣布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配合习近平逐步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进程，当局积极设法通过言论审查、宣传和检举言论等手段来捍卫习近平的形象。

新的《网络安全法》赋予中国政府广泛的权力来控制科技公司如何运作。这些公司必须将他们当地用户的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并协助安全机关获取用户的隐私信息。为了遵守这部法律，苹果公司与一家中国国有公司合作将中国 iCloud 用户的信息存储于当地服务器，使得这些信息更加易

于受到政府的入侵。

在这一年里，最令人担忧的事态发展之一是国家监控活动的激增，尤其是在西部新疆地区。那里的居民受到无处不在的、配有人脸识别技术的街边摄像头的追踪，他们还被要求下载一款手机应用，允许当局在手机上搜索与黑名单内容匹配的文件。

在全国范围内，有关部门正在试验一种社会信用系统，通过结合公民的线上和线下行为数据来评估公民的“可信度”，然后将他们列入交通服务或教育机会的黑名单。

自由之家“技术与民主”研究项目主管阿德里安·沙赫巴兹 (Adrian Shahbaz) 表示：“过去的一年已经证明，网络可以用来破坏民主，正如它可以动摇独裁统治一样”。

数据被泄露情况的快速增加凸显了加强对用户信息和隐私保护的迫切需要。民主国家和极权政府都在以数据安全的名义进行改革，但一些举措实际上通过强制实施数据本地化和弱化加密措施，破坏了网络自由和用户隐私。在印度，一次影响到 11 亿公民的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再次表明，在政府要求将数据存储在当地无效建议之外，该国需要对数据保护结构进行改革。欧盟提出的雄心勃勃但并不完美的《全面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或许是一个更有前景的数据保护措施，这个条例已经在 2018 年 5 月生效。

“为了民主体制在数字时代的生存，科技公司、政府和公民社会必须携手寻求真正的解决方案以应对网络操纵和数据隐私不足，”自由之家网络自由项目主管萨尼亚·凯莉 (Sanja Kelly) 说。“网络用户必须被授予权力，以防范他们的个人生活受到政府和公司不当入侵”。

在过去的 12 个月，不实的要求和仇恨宣传助长了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和孟加拉针对少数族裔和宗教的暴力行为的爆发。其中斯里兰卡是网络自由度下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谣言和虚假信息引发主要针对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治安暴力冲突之后，当局关闭了社交媒体平台。在印度，网络用户经历了数量前所未有的网络中断，部分原因是由于 WhatsApp 上传播的谣言。

沙赫巴兹 (Shahbaz) 说：“切断互联网服务是一种严厉的应对措施，尤其是在民众可能最为需要它的时候，无论是辟谣、与亲人联络，还是避开危险地区。”“纵然故意伪造内容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但一些政府越来越常利用‘假新闻’作为借口，加强它们对信息的控制，压制不同意见。”

在埃及，一名黎巴嫩游客因“故意散布谣言”被判入狱 8 年，她之前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描述了她在开罗时遭遇的性骚扰。在卢旺达，博客作者约瑟夫·纳库斯 (Joseph Nkusi) 被判 10 年监禁，罪名是煽动公民不服从和传播谣言，因为他质疑卢旺达政府对 1994 年种族屠杀的描述，并批评这个国家缺乏政治自由。

#### 主要研究结果：

自由度下降国家的数目连续八年超过上升国家：2017 年 6 月以来《网络自由报告》评估的 65 个国家中有 26 个经历了网络自由的恶化。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埃及和斯里兰卡，其次是柬埔寨、肯尼亚、

尼日利亚、菲律宾和委内瑞拉。菲律宾和肯尼亚的下降幅度使得这两个国家的评分从“自由”降格为“部分自由”。19个国家的情况有所改善，其中亚美尼亚和冈比亚的总体网络自由度得到提升。

中国把数字极权主义推向世界：在《网络自由报告》评估的65个国家中，中国官员针对新媒体和信息管理，为来自其中36个国家的代表举办了培训班和研讨会。中国国有和私营公司正在38个国家开发电信基础设施，而像海康威视（Hikvision）和云从科技（CloudWalk）这样从事监控业务的公司正在向18个国家销售人脸识别技术，用人工智能来识别和监控民众。

政府以“假新闻”为由打压网络异见：至少有17个国家通过了或者打算制定法律，以打击“假新闻”和网络操纵为名限制网络媒体。13个国家有公民因散布所谓“虚假信息”受到起诉。

当局要求管控个人数据：自2017年6月以来，有18个国家的政府加强了国家监控，为了不受限制地获取数据，它们往往避开独立监督并弱化网络加密。有至少15个国家在过去一年考虑订立数据保护法，但其中包含了一些易于走入歧途的举措，包括只要求用户的数据存储在本地，而不提供保护防范政府的不当入侵。

美国网络自由度下降：联邦通信委员会取消了保障网络中立的规定，这个原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不得以网络内容的类型、来源和去向来安排网络流量的优先级别。公民权利和隐私拥护者受到的一个打击是，国会重新授权《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包括其中饱受争议的第702条，因而错失了一次改革监视权力的机会。尽管网络环境依然是蓬勃的、多元的和自由的，但是虚假信息和极端党派化内容是人们持续迫切关心的问题。美国排名第六位，保持了网络“自由”地位。

网络维权活动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网络依然是民主变革的一个工具。亚美尼亚民众由于有效地使用社交媒体平台、通信应用和网络直播服务，实现了4月份的“天鹅绒革命”，使该国网络自由度由“部分自由”提升为“自由”。埃塞俄比亚新总理释放了关押的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并承诺减轻该国严格的网络控制，使埃塞俄比亚的网络自由度因此得以改善。 🇪🇹

[【返回目录】](#)

## 盛洪：民企退场否定改革开放 40 年根基

[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首发于多维新闻网 ]



本文作者盛洪

**多维：**“私企退场论”的讨论由吴小平在网络中引燃，并延伸至“国进民退”这个话题。近期习近平和刘鹤先后出面否认“国进民退”。首先，对于民企的现状，你有着怎样的判断？“国进民退”是否言过其实？

**盛洪：**肯定要反对国进民退。事实上国进民退不是刚刚开始，而是已经很长时间了。在 2009 年天则所对相关话题做过一个研究，并在 2011 年发表了一个关于国企状况的报告，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时讨论的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的一种国进民退。当时国企和民企虽然都是企业，但实际上不是公平的竞争者，因为国企拥有很多优惠政策，并免费或者低价使用、获取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最终导致了实际上的国进民退。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国企始终拥有优惠待遇，而民企则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境。

不过，这种竞争不公平的状态虽然不对，但目前看来并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民营企业的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掌握公权力的人利用市场之外的手段，诸如政治手段或行政手段，威胁、恐吓民营企业并使之退却，甚至夺取民营企业的产权，这种情况很多。这也是一种国进民退的表现。

严格来讲，不应该称之为国进民退，因为“国”这个字是一个历史和文化的概念，而非简单政府的

概念。当谈及“国”时，实际上谈到的是一片土地上形成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其中包括国家、政府秩序。所以，更准确来说，现在这种情况应该称之为“官进民退”。

我们在研究国有企业时，往往也认为，国有企业其实不是国有的。因为国有企业需要最终表现为所有权、产权，产权的收益归国所有。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从 1994 年开始到如今，基本上没有交一分钱利润，即便上交了点利润，也是将利润再投资。可以说全国人民自 1994 年之后没有从国有企业利润中拿到一分钱。同时，国有企业被所谓掌握公权力的官员把控，所以为何要强调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并且拒不改革国有企业。总之，如今的国有企业并非国有，而是某些“官”的利益范围，它的扩张不是国家的扩张，而是官的扩张。

吴小平之类的讲“民企退场”，是因为在此大背景下，看到这样的一种趋势，甚至存在一种政治投机的心理，才说出这样的话。这样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次他也颠覆了所谓政治集团的经济基础。

因为，如今中国政治集团实际上也很清楚，他们的利益实际上是和民营企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社会真正的财富是民营企业创造的，而国有企业并没有创造财富。

**多维：**这是有数据支撑的？

**盛洪：**是的。我们的国企报告中有说明。中国的国企在经营中吃补贴，免费或低价占用土地等。所以，不管如何掠夺中国的财富，首先应该先让民营企业活下去。

具体数据可以看天则所 2011 年的报告，《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在 2015 年我们又做了数据的更新。

首先，国企报表上的利润是虚假利润。就如刚才提到的那样，国企免费使用土地，而土地成本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市中心的土地成本，事实上很多国企占有了大量大城市的市中心，而这些成本并未算入。

其次，利息。国有企业能够以非常低的利率获得银行贷款，民营企业并不能。假如让国企缴纳正常的利息，国企利润必然又会少一大块。

还有国家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如石油、煤矿，国企缴纳的矿区使用费，也是非常低的。以石油为例，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合资企业如果在中国开采石油，将缴纳收入的 12% 的矿区使用费，国有企业只需每吨缴纳 30 元，而原油大概 7 桶 1 吨，每桶 70 美元左右，1 美元大概 7 人民币，估计 3500 人民币每吨，30 元的矿区使用费是非常少的。

另外，政府补贴也是一大块。

所以，排除这几大块之后，国企几乎都是亏损的，不创造财富。

反过来看看一下民企数据。大约从 2000 年开始，所有新增的就业都是民营企业创造的。近几年，民营企业创造了新增 GDP 的 90% 以上。

**多维：**既然提到国进民退是一个历史现象，那么此时的国进民退和前些年中国的国进民退有哪些

新的变化。

**盛洪：**总的来说是变本加厉。之前是市场中竞争不公平的问题，现在是政府或官员用其强制力逼“民退”，背后存在政治权力的操作，也导致一些民企不得不参与到了官场的斗争，成为官场斗争的牺牲品。

很常见的手段就是，如果民营企业不“上交”民企，就会直接抓进监狱，甚至丢掉性命。比如曾成杰案就非常典型。

可以说，民营企业如今面临着各种困难。但如今最大的问题就是产权无法得到保障。事实上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发过一些文件用以平等保护产权，中共高层也的确看到了这个问题，但制度上不变，不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民营企业将无法获得根本上的保护。如果不抓强盗，如何保护产权？

**多维：**中共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明确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也在此次“私营经济离场”的讨论中明确给出态度，肯定并且支持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但也与此同时做大做强国企的声音也在。中共似乎希望两者兼得，但这是否也是一种矛盾？

**盛洪：**这一对矛盾存在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从中共高层来说，知道这个国家的财富是由民营企业创造的，所以推行剿灭民营企业政策无异于自杀，也包括中共高层。因此保护民营企业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只是利益集团拥有抢的权力，支持民企并不代表约束抢的权力。民营企业创造更大的财富，他们要抢更大的份额，从这个角度看并不矛盾。

**多维：**那么国企究竟因为什么原因，如管理层面或者制度层面，使得其无法获得经营效率实现盈利。

**盛洪：**国有企业本身并非企业，没有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国企的角色目标并非赚钱，其优势是政治权力，所以国有企业并不一定要尽可能发挥其市场竞争的优势，而是尽量放大其政治优势，比如低价获得开采权，获得更多的政府补贴和利率优势，如今则是抢夺民营企业，低价收购民营企业。

**多维：**按照你的说法，市场经济中就不应该存在国有企业这样一种经济组织形式？ ...转自多维新闻网

**盛洪：**国有企业不是市场中有效率的企业，但也不能将话说得太绝对。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可以存在，但需要做到公平竞争，不应该有比民营企业更多的优惠和补贴，而且需要让市场竞争来决定存亡。

**多维：**中国也的确对民企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这应该是无法否认的。

**盛洪：**这就去看提到的优惠是怎样的概念，与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相比，有何优势。比如，几年前有人对中国股市中的国企、民企交的企业所得税进行分析，得出民营企业的所得税平均税率为利润的24%，按照规定是25%，几乎是满的。但国有企业是10%。所以可能的确有优惠政策，但需要具体去分析。

**多维：**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近日发表观点：“民营企业要坚持职工主体地位，以职工为本，让职工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共同参与企业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民企管理权，职工民主权利、政府管

理职责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厘清。

**盛洪：**首先企业是经济组织，目的是追求利润，以资本为核心。所以企业的权力结构和治理结构是以股东大会、董事会为核心，而这样一种结构被证明是有效率的。那么是否有以工人为核心的企业？也存在。前南斯拉夫曾试验过，只是现实证明其效率不高。还有是以色列的基布兹，也因效率不高逐渐衰落。当然，工人的利益必须要保障，工人也是市场要素中的一元，假如资本处于垄断地位，工人就处于非常不利的谈判地位，所以工人要有自己的力量，即所谓的工会。这是工人的利益所在，也是正常市场制度下的企业架构。但职工代表大会越过了权力，直接去参与分配和介入管理，那就会存在问题，如效率低下。工人与资本本身是存在利益矛盾，是需要通过谈判去协商的，但工人直接决定资本分配，甚至是经营管理，那就会出现问题。目前看来，最棒的公司的经营管理属于市场中涌现出的企业家，市场中的竞争往往就是企业家之间的竞争，而很多企业家往往也是天才，善于经营、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如乔布斯、比尔盖茨、马云等。

**多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私营经济从无到有的历史。如何评价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盛洪：**民营企业的确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作用。当然不能否定国企的作用，毕竟之前中国都是国有企业，改革开放的成功一定程度上也离不开国有企业稳定的发展和改革，这是不能否认的。而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也是民营企业改革开放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作用和国有企业稳定作用共同影响之下实现的。

**多维：**你如何理解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流失后极有可能成为个人的企业，那么这会对提高企业效益有用吗？

**盛洪：**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真正成功的民营企业不是国有资产流失造成的，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之后，比如腾讯、阿里等。一开始是民营企业，它就可能会有个好的传统和基因，毕竟创业之初都是自己的钱，珍惜并且努力改善管理和制度以及技术创新。当然也无法否认，也有一些国有资产流失后的企业可能是不错的，当然从逻辑上可以这样去推断。另一方面，如今国有资产流失的主要形态并非直接变为私人的企业，而是一个人可能是国企的内部人，比如高管，但他同时在国企外还有自己的企业，利用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将国企的一些业务，比如采购业务转移到自己企业中。

**多维：**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有开放民企进入某些关键领域，打破国企垄断的呼声，这会不会是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但也与此同时，今夏滴滴出行公司发生的事情也说明，由于其已经在出行领域实现了垄断，导致其在整改过程中似乎动力不足。所以针对垄断问题，你认为中国将面临着怎样的困难和阻力。

**盛洪：**关于垄断也有必要分国企和民企。国企垄断叫行政性垄断，通过行政文件来实现垄断。民企垄断属于在市场中的垄断，如滴滴，它可以采取市场中不正当竞争的手段来打击竞争者，以实现垄断

地位。两种垄断有着不同。 国企垄断难打破，是因为这是行政部门授权的垄断。事实上在一些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这种行政性质的垄断企业是不允许出现的，只有立法机关授权的垄断。垄断是一种特殊情况，并非不能垄断，这种特殊情况必须由立法机关批准和授予，行政部门只是执行部门，没有权去授予垄断权力。中国宪法和立法法提到这一点，如基本经济制度的设立，需要通过立法。垄断是违反基本经济制度，即市场制度的特例，所以只能通过立法。可见中国法律文本中同样没有给予行政部门权力，只是中国事实上是这样一种情况。举例来说，发改委是无权去授予某企业垄断地位的。事实上行政性垄断已经说了好多年了，上一届政府也提到过，但非常难以打破。 垄断权是一种特殊权，立法机关在给予时也需要有非常慎重的考虑。而市场公平竞争是一般性规则，企业间是一种平等地位。所以，如果仅仅以形式上满足，让中国立法机构给予某些企业与垄断地位，这也是欠妥的。因为这就与中国目前政治结构现状有关。

**多维：**也有一种说法，诸如中石油和中石化这样的涉及中国国家重要资源的企业，就应该赋予垄断权？

**盛洪：**并不能认同，这种说法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重要的领域每个国家都有，诸如石油，对任何国家都重要。而在美国，美国的石油企业就是民营企业，而推而广之，世界上大多数石油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无论企业是否处于重要领域和战略地位。而中国的情况是少数。当然，中国有必要做到，这些重要领域不让外国人去插手经营，如果怀疑外国人对中国有威胁的话。可以理解不相信外国人，那为何不相信中国人成立的民营企业？而也因此，中国形成了国有垄断集团，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足够的好处，反而还压榨中国人的血汗，有几次油荒，就是他们制造的。他们可以以此来要挟中央政府。如果有多家石油公司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垄断的对象不仅仅是老百姓和消费者，还会影响到政府。政府面对更多的企业，总比只面对一两个企业时，更好对付。所以，垄断并未让人们感到更安全。 我们此前有一个报告提到过中国油荒问题，而这个问题，是相关管理部门的人说的，他们发现了中石油中石化制造油荒的证据。周永康把持着石油系，贪污千亿，给中国同样造成了巨大的问题，这就是垄断的问题。国企垄断后获得的，也并不会成为全民的，而是贪官和利益集团的。

**多维：**那么私营企业的垄断呢？

**盛洪：**首先，中国有《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我们可以诉诸于法律。当然我不赞成轻易拿这条法律去解决问题。 其次，以滴滴为例，市场上并非没有竞争力量，如滴答，只是做的并不是太好。滴滴如果实现垄断，提高价格，并且提供不良的服务，它根本无法持久。可以预见，如果滴滴继续这样的话，它的垄断地位是无法保持的，这与行政垄断是有本质区别。世界上对于垄断的评判标准，并不以其市场占有率来评判，而是根据行为。如果有垄断行为，那么就是垄断，假如哪怕占有 100% 的市场份额，但没有垄断行为，也不算垄断。中国有一些市场还是不错的，比如在旅行网站和服务平台，如果艺龙不好，你可以换携程、飞猪等，买书网站，如果当当不好用，还能用京东、亚马逊等。

**多维：**从理论上讲，此前采访的一个老师认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始终也是必须要解决马克思提到的“私有制”这一问题，并且认为马克思提出的“公有制”在之后各国的实践中并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资本主义的最大的也是不能够根除的问题。那么在你看来，私有制是问题吗？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的今天，该如何答复马克思当年提出的这个问题？

**盛洪：**首先我不会对马克思的论断困扰，因为中国并非一定要解决马克思这个问题才能向前走。如果被马克思困扰，那是非常奇怪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关键的一点就是不提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不争论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考虑问题先从概念出发。如果做的事情符合好的概念，那么就做，如果是不好的概念，那么就不做。这个逻辑是错误的，也不是正常的思维方式。所以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哪一种做法能够带来好的结果，这是核心。

**多维：**但如果很多问题不去回答的话，比如如今中国发展迅速，但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两极分化现状，一些人就把这种状况归咎于私有制。可以说公有制存在不好的状况，但私有制也不是尽善尽美的。

**盛洪：**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很多私有制为主的国家，贫富差距也是很温和的。两极分化的原因还是因为有权与没权的两极分化，而不是私有制造成的。私有制有两种，一种是小私有制，每个人拥有供自己生存的，即洛克提到的私有制，这种私有制是人基本的人权，不能否定这种层面的私有制。从历史上得出，私有财产归公后，并未真正成为公有，而是归于了某些人。也正是因为对私有制的否定，给世界造成了多少灾难？另一种是大私有制，是近代工业化以来产生的，表现为大型企业，拥有巨大的市场，同时提供巨大的就业岗位。

**多维：**不过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天然就与公有制这个概念联系在一起，也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共的执政合法性，虽然中国在理论层面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图将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打通。在你看来，如何打通，或者甚至不用打通？

**盛洪：**我认为这是庸人自扰。如果仅仅是概念，如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没有用的，同时历史也证明是错误的。其实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智慧。在中国八九十年代，当时意识形态问题比如今更为严重，当时也没有这样的焦虑。邓小平伟大的智慧在于，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和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所有符合经济发展和提高工作效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共的执政合法性也不在于打怎样的旗号，中国老百姓支持中共也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中共的执政合法性来自于改革开放创造的执政合法性，而不是三年灾害和文化大革命。 ■■

[【返回目录】](#)

## 张干帆：广州，请带头回归法治文明的底线

[张干帆 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宪法学教授。本文首发于 2018 年 11 月 15 日 FT 中文网]



本文作者张干帆教授

在我走过的有限的大江南北中，广州是我最喜欢的一座城市。除了天气炎热，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缺点。我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广州人的开放、务实、温和而充满活力，而这些优点归根结底是四十年改革给广东带来的。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桥头堡，这里成了中国最自由也最文明的地方。开放带来自由，自由让人平等相处、通情达理，而不会像传统计划经济的命令—服从模式那样让人变得蛮不讲理。慢慢地，人们会更习惯用情理和法律，而不是权力和关系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公权力在相对发达的市民社会面前也会显得相对谦卑与克制。这就是我对广州的良好印象。

当然，一个自由的城市注定少不了是非，这本是十分正常的。2003 年春夏之交源于南方的“非典”，很可能是“吃出来的病”，但也正是当地的《南方都市报》首先揭开了“非典”的盖子；与此同时的“孙志刚事件”正发生在广州，也是南都报一篇《一位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捅出了事件的真相。报社领导后来为良知和勇气付出了代价，但这并未对充满活力的“南方系”产生“寒蝉效应”。此后十余年，它是广州最大的“正资产”。“孙志刚事件”发生在广州，却并非广州之耻；悲剧哪里都有，但只有一个自由的城市才有足够的自我纠错能力，让悲剧不再重演。事件过后，人们并没有纠结于孙志刚之死是因为警察扣押了一位在广州合法暂住的大学生这样的细节，而是聚焦于遍布全国的收容遣送的制度之恶，并盛赞南方报系的报道不仅让类似的悲剧不在故地重演，而且帮助全国终结了一项施行多年的恶政，

“孙志刚事件”也成了公民推动制度进步的一个里程碑。因为自由，广州变得更文明了。记得多年前还在辩论“广州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广州这一边。

然而，时过境迁。近年来，广州似乎变得不那么自由，也不那么文明了。先是女律师孙世华披露，自己遭到了荔湾区警察强令脱衣检查的羞辱。虽然律师和警察各执一词，但是警方不仅一直拒绝公布事发当时的视频录像，而且还拘捕了当时在场的数位目击证人，不免让人心生狐疑。如果错在律师，为什么不公布视频呢？重庆大巴坠江事故发生后，曾有报道说大巴是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逆行小轿车，但是短短十几秒的视频公布，什么都清楚了。公布律师和警察交涉过程的视频有那么难吗？如果错在警察，证据“不便”公布，那么荔湾区警察的这一行为无疑是极不文明的。而在尚未证明自身行为合法性的情况下，荔湾区公安局又拟对孙律师下达处罚通知。

最近又有“寻月小组”发布寻人启示称，北大毕业生岳昕和北医大毕业生顾佳悦已“失踪”两个多月，据说被控制在广州，顾佳悦还被“跨省追捕”了。两位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失踪那么久，家人却没有得到任何正式通知，甚至全然不知被拘押在何处。还有中山大学硕士沈梦雨，据说也已失踪很久。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在广州，这样的行为不仅违法，而且显然也很不文明。

以上几位恰好都是女性，而对待女性的姿态是衡量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文明的尺度。胡适开玩笑说，“怕老婆”是民主国家的特征，但此言不虚。尊重女性不仅是一种风度，也是法治文明的底线。人民之所以设立国家，国家之所以供养警察，是要让他们维护文明、制止野蛮。如何区分文明与野蛮呢？也很简单，中国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动手，那就是野蛮了；如果只是动口，则虽然可能说的不对，也仍然属于文明社会自由表达的范围。对于暴力行为，譬如重庆大巴上打骂司机的那位女士，国家理当依法以暴制暴；但是对于不同意见的自由表达，即便表达的方式有点激烈，只要没有行动或明显煽动暴力的言论，即不得动用警力强行控制。文明国家使用暴力必须具备正当理由。如果无端使用暴力，那么警察就不是在维护文明，而是在实施野蛮了，而一个不让人民自由说话、讲理的国家一定会培养出一个官吏横行霸道、百姓冷漠暴戾的野蛮民族。

和男性相比，女性显然更为柔弱，一般不会有暴力倾向（重庆大巴上的那位女士例外），因而也没有正当理由对她们实施任何国家暴力。以上几位女性都很勇敢，其中一位是为了老上访户维权，其他三位则是因为声援深圳佳士工人而失去自由。她们的政治立场或左或右，或未必明确，但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们有过任何暴力行为或煽动暴力的言论。按“无罪推定”原则，她们都在合法行使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都应该受到国家的善待。至少，她们的自由和尊严不应该受到伤害。

就在大学生失踪的同时，据说深圳佳士数名维权工人已遭到刑事拘留。关于今年7月发生的佳士维权事件，不同媒体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工人因为待遇恶劣而要求组建工会，在此过程中遭到黑社会暴力打压；官方媒体则称，有些工人强行进入工厂并“冲击派出所”。如果确实发生了暴力行为，当然可以采取刑事措施，除非有关行为构成针对暴力侵害的正当防卫。但如果工人只是要求改善待遇、组建工会，那么他们显然不能因为行使宪法第35条规定的结社自由而受到刑事处罚。在政府眼里，组

建工会也许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实际上恰好相反。一个真正的工会不仅能有效维护工人的权益，而且能帮政府节省许多麻烦。工会多了，工人得以自我保护，工人待遇得到基本保障，当地的劳资矛盾得到及时解决，罢工、上访乃至跳楼就少了。多一点自由，就多一点文明，政府身在其中也会受益匪浅，应该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至于此次事件的组织者，也是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某些左派组织所为，官媒则称是“境外非法组织”策划。作为外地群众，我们不明此次事件的真相。但众所周知的是，“境外敌对势力”早已成了几乎所有政府违法的保护伞；不论公权力做错了什么，只要给对方贴上这个标签，一切问责统统摆平。政府不用反思道歉，更不用调查追责，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抓出“幕后黑手”交差。这一招真管用，但凡是国内重大公共事件，就必然有“境外敌对势力”做推手，至少境外媒体都会关注报道嘛。可是，“阴谋论”或许能为地方官员免责，但真的能帮助地方解决问题吗？我们能不能思维简单一点，不要那么在意这个“势力”、那个“黑手”，只要问问自己在行使公权的过程中有没有超越法治底线；如果自己有错，再大再黑的“境外势力”也不能成为追究公权违法的挡箭牌。

我并不是说广州现在做得比其它地方差。和许多地方相比，广州警察或许还文明不少。但是和其在中国改革之初即留下的历史记忆相比，广州近期的某些做法似不符合公众对这所美好城市的期待。当然，在目前大环境下，广州或难独善其身，但是回归法治文明的底线、纠正自己的错误而非推诿于某些外部因素，完全是在地方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文明的步伐终究是挡不住的。与其成为法治文明的绊脚石，不如在改革四十周年之际再带一次头，让广州率各地之先回到法治文明的轨道。这次不妨从尊重女性开始，把属于她们的自由、安全、尊严还给她们。

久违了，一个开放、自由、文明而尊重法治的广州！我们期盼你早日回归。 🇨🇳

[【返回目录】](#)

## 盛洪：小民生计，大国根基

[盛洪 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2018年11月16日中评周刊-与 FT 中文网同步首发]

近些年来，我每年秋天都要去一趟墙子路长城，这里的秋色分外好看。今年我刚把车停下，就有一个农民走过来，告诉我不能在这里登长城，因为要保护。谈话中，我知道他拿了政府的钱，就要尽职尽责。我看到附近已经开发了“古长城度假村”，较大的停车场也是新建的，显然本地的农民最终下决心要利用本地的长城资源发展旅游。于是我感到了一种逻辑上的悖谬，政府花钱雇农民，做一件断农民财路的事情。当然，保护长城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否这是一个完全否定附近农民经济权利的至高无上的目标，还是一个可以与本地发展互补和兼容的事情呢？例如向登长城者收取适当的“长城维护费”，再雇专人维护。我们暂不讨论这个细节。

中国今天的成就全赖市场化改革。市场制度是一种无数分散个人分别自由决策的规则，我们无法知道这众多个人的决策会合成什么样的结果，但我们知道，这一结果一定要比计划当局决策的结果好得多。所以市场制度的基础，就是每一个人的经济自由，而不只是某些人的经济自由。一方面如哈耶克所说，“由于自由的价值在于它为不曾预见的和不可预测的行动所提供的机会，所以我们也鲜能知道对自由施以特定限制究竟会使我们失去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判断这一规则通行于整个社会了呢？很简单，只要我们发现有一个人的经济自由受到不当限制，我们就能得出结论来，经济自由原则受到了损害，这一定会涉及更多的人。

经济学有一个“投资乘数”的概念，说的是一笔新增投资会带来数倍的市场需求。这是因为新增投资会同时增加等量的收入，人们将一部分收入作为储蓄，消费掉其余部分，而这又会成为其他人的收入，如此循环往复。最后形成数倍于最初投资的需求。其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前提就是市场制度。如果任何一个人的交易自由受到限制，市场交易被政府干预而不能顺利进行，其中哪怕一个交易被政府阻断，乘数形成的机理就会遭到破坏。当已经存在的市场制度遭到政府干预，已经起作用的乘数就会失效，也就相当于除数。市场经济虽好，但经不起政府干预的折腾。不用太多时间，经济就可能进入萧条。如果说市场能够给我们带来“意外惊喜”，干预市场就会给我们带来“意外的灾难”。

例如，政府限制城市发展规模。这种政策目标已经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规划之中。其政策手段就是用强制力驱赶外来居民。这既带来了震惊中外的“驱赶低端人口”，也在人们并不关注的时候，持续地关闭小商铺，勒令外来居民迁出，停办民工子弟学校，等等。但这立刻毁掉了数十万人的生计，上百万人的生活，也涉及相关的经济产出，以及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有大量提供商业零售、餐饮、洗车、理发、快递等其它服务的人员，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也就失去了相应的收

入。在另一方面，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出租房屋的人被禁止出租他们的房屋，也就没有了租金之利；那些在这里为他们提供服务谋生的人，也没有了谋生收入。

也许有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局部的事情，无关全局。其实不然。仅拿北京和上海两个公开宣称控制人口规模的大城市来说，一个限制为 2300 万人，一个限制为 2500 万人。与世界上其它大都市，如东京的 4200 万比，还有很大规模潜力。到 2016 年，北京人口已出现负增长。假定这两个城市各减少了 200 万人。我们假定这些人离开这两个城市到其它地方谋生，或因限制而不能进入到他们本来想进入的北京或上海，只能获得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以北京的人均 GDP128992 元和上海的 124600 元减去全国人均 GDP，则近似地看作是限制人口规模的效率损失，各乘以 200 万，共约 2774 亿元。2017 年中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 0.4，代入乘数公式，共损失收入 4670 亿元。这相当于 2017 年 GDP 的 0.57%。

但连锁反应还不止于此。那些被储蓄的收入也并没有退出市场。无论是居民直接投资，还是存入银行或购买其它金融产品，这些钱还是作为投资需求增加了社会的总需求。出售投资品的人会将收入变成新的需求，出售金融产品的人获得了这笔收入也要购买金融产品，如此循环不已，也形成了一个乘数。只有一个限制，就是银行储蓄还要扣除准备金。因而，这个乘数就叫做“货币乘数”，粗略地，它就是准备金率的倒数。假定准备金率为 9%，则上述限制城市人口的效率损失 2774 亿元的储蓄部分，所可能由货币乘数带来的潜在需求为 18493 亿元，加上上述消费部分的损失，因限制北京和上海城市人口所带来的损失可达 2.8 个百分点的 GDP。当然，无论是投资乘数还是货币乘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循环完成，如果货币周转的速度较慢，也许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但这只能使这种损失分布在更长的时间中，在短期内更不易察觉而已。

而限制规模的作法并没有使北京或上海的环境变好，反而减少了要素供给。首先是房屋供给。一些在北京工作被剥夺城郊住房的人仍要在北京居住，就只能到城内居住。这使得北京更为拥挤。这立刻就显形了。据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今年 8 月的房租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25.8%。这或者直接影响了不少企业的成本，或者使得在北京的外地青年人无法承受，考虑退出北京。一般而言，企业的地租成本约占企业成本的 5%，如果为了弥补房租上涨，地租成本就要提高 1.25 个百分点的企业成本。面对成本的上升，企业或者提高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这就会形成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或者因处于竞争领域中，不敢涨价过多，从而自己消化成本上升。而减少劳动力供给就直接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所以在竞争的物流业价格上涨了 10%，而我们社区门口的油条价格涨了 50%（这算地理垄断了）。更糟的是，花钱也买不到服务，例如我们现在只能自己洗车了。

实际上，城市就是市场在具体空间中最有效的体现，通过人口的集聚带来市场网络外部性，创造出更多的交易机会和交易红利。它因此吸引人们向这个利益中心进一步集聚，直到集聚的成本，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和地价腾贵等上升到抵消集聚带来的好处时，才会停止。人们只要能京沪谋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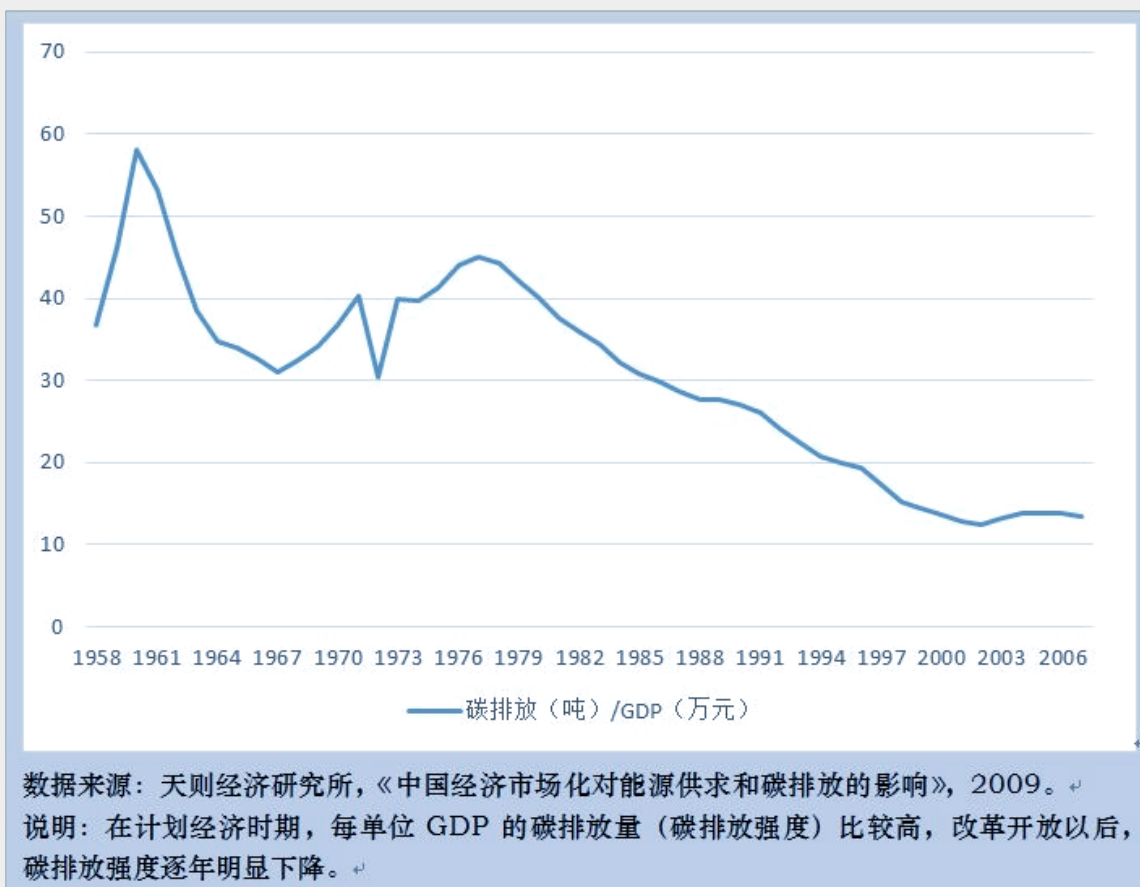
计，就说明这里还有集聚红利，有人需要他们的生意，从整个社会看也就多了一份 GDP，无需别人来证明他们在这里的合理性。用某一资源（如水）的缺乏来证明要控制人口，是以单一目标来否定综合结果，根本没有注意到从整体来看是得不偿失的。如果各种资源都由市场定价，或人为制定接近市场的价格，更稀缺的资源可以通过调整价格来获得新的平衡，根本无需大动干戈，以致在冬夜拆毁别人的房屋。从另一个角度看，减少或消除政府干预，也反而会减小像北京这样的城市的规模。这我在《从城市经济学看雄安计划》一文中已有讨论，不再赘述。

又如，以保护环境为名，对生产和生活行为加以限制。众所周知的，是政府强制性地要求煤改气，即使气的设备还没有安装，或还没有通气，就要求停止烧煤取暖，冻着了许多乡村的孩子；大家不太知道的，是政府要求农民不能将秸秆烧掉，而是要将秸秆加工处理。这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政府通过强制性命令的形式实施。有些农村地区反映，乡村干部要经常巡视田间，如果发现地方冒烟，就要“干部摘帽，农民戴铐”。这种行政行为当然是违反法律的。结果是，农民不敢再用烧秸秆这种简便的方法回收秸秆肥力，也没有额外的精力用别的方法处理秸秆或将秸秆运出，结果就因这一件很小的政府干预，而大量放弃耕种。这不是一件小事，马上又显现了宏观上的结果。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比上年减产 306 万吨，下降 2.2%。其中就可能有不许烧秸秆的原因。

问题是，这些表面为了环保的作法在实际上既破坏了市场的作用、减少了经济产出，却不能达到环保的目的。科斯教授指出，有关环保的问题有“交互性”，即为了环保会提高企业成本或带来损失。不能简单地为了单一目标就由政府强制推行环保措施，而应通过市场交易平衡两方利益，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他于是提出了“排污权交易”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含义是，既然企业生产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污染，肯定不能人为地为了环保就关闭企业，就只有给一定的排污权额度，然后让企业在市场中交易。这个建议很快被美国政府和市场所接受，并经过实践，最终形成了成熟制度，产生了环保的效果。这种方法其实也被介绍到了中国来，并在许多省份进行了试验。但在总体上并不成功。这是因为排污权要依赖于政府进行初始界定和分配，但中国的政府制度还存在很大缺陷，以至不能公平和有效地界定和分配排污权。

然而，科斯理论的基本精神还是可以用来指导环保工作。即在采取环保措施时，一定要想到其可能产生的成本和带来的损失。其实，在环保时不违背市场原则，考虑效率因素，也正是环保所需。因为我们不仅要从绝对量上考察排污，也要从每单位经济产出的排污量来考察环保成绩。我们在 2009 年做过《中国经济市场化对能源供求和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从 1980 年到 2005 年，中国的市场化指数从 4 提高到 6.3，碳排放效率（GDP/碳排放）从 920 美元/吨提高到 2560 美元/吨。”反过来，就是每单位 GDP 的碳排放强度（碳排放/GDP）在下降，“从 1980 年到 2004 年，OECD 国家的碳排放强度指数平均每年下降 2%，而中国的这一数字则为 4.4%”。因为有这样的底气，温家宝总理才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承诺，中国到 2020 年，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还要下降 40~45%。如

果采用政府直接干预的方法减排，也许会降低一些碳排放，却因更大幅度地降低经济产出，而使碳排放强度提高。



实际上，烧秸秆带来的大气污染在全部污染中有占很小的份额，并且是季节性的，而工业污染、汽车和其它交通工具的污染是大气污染，尤其是构成雾霾的持续的主要部分。但我们的政策并没有限制汽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也没有限制工业生产。即使搬迁了一些工业企业，其目的也不是为了减少废气排放总量，而是为了地区性环保目的。而在所有这些相关人群中，显然农村居民是收入最低且政治最弱势的群体。所以不许烧秸秆这一所谓环保政策，就是一个正面影响很小、却损害最大多数中低收入人群的政策。按照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如果一个社会不得不改变市场的初始分配，也只能向最低收入人群倾斜。而这种禁止农村居民烧秸秆、并强制执行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

再有，就是过度安保。一个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应该有一定的安保措施，但如果过度安保，安保半径过大，措施要求太高，就会带来大量的经济损失。损失包括两方面。一方面的大幅增加了安保成本，另一方面增加了其他人的不安全。实际上，安全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如果对一些人过于安全了，或者无端做过多安保无用功，就有可能对其他人不安全。以一个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为名打破周边居民正常生活，要求周边企业停止经营，就是这些居民生活的不安全，企业产权的不安全。所谓产权安全，就是其运营要稳定和可靠。如果有过多不可预料的因素使之停止运营，这个产权就不安全。极而言之，真正的和整体的安全，就是宪法得到遵守，民众的宪法权利受到保护。

例如，对于北京的安保，在一个时期，就已经扩张到了周边的华北各省份。在山西的高速公路上就开始了进京安全检查。在北京六环之外设立安全检查站，尤其在高峰期间，可以造成极为严重的堵塞。前年十一假期我从北边返京，竟在八达岭高速上堵了 7 个多小时。又如，因会议而让企业停工。我亲眼所见的极端例子，是因为一个政治会议让距离北京 750 公里的企业停工。而就是在一处工业园区，加上煤改气带来的成本上涨，已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因亏损而停产。这种过度安保的负面影响看似很局部，实际上也会带来宏观结果。例如，如以华北地区计，假设每年因会议而使 1/5 的企业停工 10 天，也是一个巨大数字。按 2016 年数据估计，减少的 GDP 也高达 1080 亿元，再考虑投资乘数和货币乘数，则高达 9000 亿，相当于当年全国 GDP 的 1.2 个百分点。更何况，近些年来，国际会议不仅在北京召开，而且在诸如杭州、青岛和广州等地召开，它们仿效北京过度安保带来的损失就更为严重。

问题是，这种过度安保不仅没有达到安保的目的，而反更为恶化安保形势。首先是，这些过度安保在技术上和物理上看没有增加一丝一毫的安全。换句经济学术语，就是安保的边际效用为零，但边际成本巨大。因为这些过度安保措施本来就只是概念上的安全，看起来毫无具体技术效果的分析，也没有显现出安保专家的智慧，只是徒然增加成本。其次，这种使别人不安全、让大众承担成本的所谓安保，除了徒增反感以外，没有一点正面意义。这在战略层次带来了政府结构的不安全。因为政府的安全首先要体现在它的政治合法性上，如果为了保护政府的安全而损害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则适得其反。一个让人增加厌恶的措施不是一个更不安全的措施吗？

总体而言，上面讨论的只是多种政府不当干预中的很小一部分，且局限于个别地区。本文并没有讨论那些更大的和全局性的干预，如对楼市，金融市场，和网络运营的干预，等等。但即使这些小的不当干预，也包含着一般性的特征。这首先在于，这些措施主要实施于北京以及上海和其它主要城市。而首都和一线城市在全国有着示范效应。据报道，已有成都、青岛、大连和西安等城市确定了人口规模控制数量。北京和上海驱赶外地居民的行为，也扩散到了一些地区，据说太原也在以整治“背街小巷和老旧社区”为名，在强制关闭小商铺。因而我们上述分析所估计的损失，还只是局部损失，放在全国就会大得多。

第二个方面是，这些作法宣示的一种价值取向，可能会成为政府的一般原则，就会带来普遍的损害。如召开政治会议或国际会议而要求本城居民停止工作，周边省份的企业停产，则意味着这个会议与普通大众的利益是直接冲突或截然相反的。这些会议在制定“国家战略”时根本不在乎“小民生计”，甚至以这种不在乎的傲慢态度来突显它的“伟大”。实际上，任何一个伟大的社会都是由无数这种小民生计聚集而成，而最高尚的态度就是视民如伤，岂敢让任何一个小民失去他的生计。相反的态度不只是让一些小民丢失生计，而是宣告着一种反市场的和侵犯经济自由的规则，它将伤害所有的人。因而，无论这些会议达成了什么决议或发出了什么宣言，会议的过度安保本身就是对这些决议或宣言的解构和反讽。

《左传》有云，“国之兴也，视民如伤；其亡也，以民为土芥。”不要以为城管收缴了煎饼摊子的家什与自己无关，也不要把大国崛起看成是可以蔑视小民生计的理由。其实对于我们最珍贵的，就是保证每一个小民生计的经济自由原则，和顾怜小门小户谋生艰辛的悲悯情怀。这些原则和情怀没了，我们的中国奇迹也就走到头了。如果我们要为我们是一个大国的公民而骄傲的话，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少繁华的都市和宏伟的建筑，有多少先进的武器和庞大的军队，出了多少进入世界排行榜的富人，而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珍惜那些还挣扎在都市边缘的人，那些没权没势的人，那些父母背井离乡、孩子在乡间孤立无助的人。如果他们的经济自由不被侵犯，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保护，我们还会担心其他人的自由与安全吗？能够关注小民生计的国家，才是一个能够立足于世界的泱泱大国。 ❷

[【返回目录】](#)

## 许章润：私塾先生

[许章润 著名法学家，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21日 FT 中文网]



本文作者许章润教授

一场大水过后，满目疮痍，天地苍茫。灾后重建，披星戴月，历经春秋，父母带着我们终于搬进新家。草屋三间，篳门圭窻，距老宅十丈，夏热冬冷。一家七口，临河而居，伴夏雷冬雪，看春涨秋落。劳生息死，形如蝼蚁。但既然是家，天地怀中一个窝，便顿觉安全而温暖。门前小径，交通东西，是小镇尽头与乡野的通贯之处。早晚总有行人，天黑则难觅身影。河对面偶有车辆经过，轰隆隆，在这个前现代的时空，倒予乡民烟火滋养的感觉。每日早中晚，不远处区政府的高音喇叭定时鸣响，播放遥远北方伟大领袖的伟大号召，音调盛大，情绪高昂。看不见，摸不着，虽遁形却有迹，无远而弗届，仿佛全知全能，因而才令人恐惧。它们喧阗而阒寂，神秘却张扬，向劫后余生的这一方水土提示着时代的行踪。

这是1970年代初期，饥馑与恐惧笼罩着乡民身心，却又仿佛有所期待。“日食半升，夜眠七尺”，岁月遂在忐忑中流走。

时常有位老人打门前经过。身板高大，微驼背。夏季破帽遮颜，冬季腰间系根草绳。印象中总是穿双草鞋，裤脚卷到膝盖以上。有时边走边朝门里张望，匆匆而过。有时停下要口水喝，站在门前一饮而尽。偶或慢慢辍饮，坐在门槛上聊几句家常，齐东野语，无悲无欢。快饮的是水缸里舀的井水，慢啜的则为暖壶里的开水。家里没茶叶，似乎只有过年时才喝上茶，有次找到一小块冰糖搅拌于井水，都说好喝。母亲对老人持之以礼，总是恭迎恭送。

许多年里，我并不知此公何人，也不曾起过打探的念头。只记得他坐在门槛上时，曾经好奇地盯着他膝盖上的疤痕斑斑。少年离乡，匆匆于生计，追逐浮华，大家都成了无根浮萍。我陌生于乡里，也早把这个人忘却。直到六年前家父过世前不久，病床前陪他说话，讲到老家往事，这才将前因后果拼连起来。

老者不老，那时节大约尚不到花甲。原是小镇教师，父母私塾的先生。文革后不久，始押于“群专”土牢，后下放务农，户口迁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其时，厉行城乡二元壁垒，乡村如洗，真正一穷二白。一年四季劳作，没日没夜，交出公粮后，而居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春荒结队乞讨，却为公权围追堵截，是家常便饭。大姐高中毕业后作为知青下乡，背包出门走远，母亲便躲进灶间，放声大哭，凄苦为平日所无，缘由在此。如此这般，先生等于被逐出化外，任由生死，而生死不得。政治止于水边，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此为古典希腊意象，一脉绵延于大西洋两岸，辗转翻新，指东打西，异己者尚有一线活口之望。源出自斯拉夫蛮族的共产极权，无孔不入，却又郭野分处，从而粘连新旧偏锋一齐发作，既纵容旧恶，复加处新辱，真正是天罗地网。可怜那教书先生，身处其间，只好荒野求生，却又难逃专政网罗。

洪水前“运动”势酣，有名无名的仇恨尽情释放。“牛鬼蛇神”批斗游街是小镇的热闹节日。记得一天清早，睡梦中为锣鼓和口号惊醒，窗前定睛，但见一千人形鬼怪，脸颊涂墨，头顶尖头高帽，五花大绑，弯腰低首，逶迤走过。那帽子总有三尺多高，摇摇晃晃。后边押送人员，挥舞棍棒，不时敲打鬼怪，将重又直腰抬起的头颅猛地往下摞压。棍棒有名，专称“文攻武卫棒”，粗若腕口，长约一米有半，两头涂红，中间染白。挥舞之际，状如火轮，飏飏带风；用力抡击，颅脑花开，肋骨声裂。

又一日，也是一大早，一群鬼怪，麻绳捆绑连接成串。他们口衔稻草，胸挂写有本人姓名的厚重木牌，头顶高帽，跪伏匍行。姓名用黑色书写，再用红色打叉。口中稻草臭不可闻，原是乡民擦屁股后扔进茅坑，早已沤烂，此刻捞起塞进鬼怪们的口中。队前两三人，臂挽竹筐，仿佛边走边撒石灰。与往昔游街鬼怪们一律悄无声息不同，此番示众，个个鬼哭狼嚎，撕心裂肺，声震天宇。走近一看，原来石灰里掺杂着玻璃碎渣，膝盖过处，血迹斑斑。石灰渗入创口，顿如火烧。围观乡民伸颈缩脖，有嬉笑耍闹者，有静观默察者，有不忍掩面泪溢者。我时年八岁，抑或九岁，等于畜生，亲历目睹，只觉肉疼惊悚，未觉心痛惶恐。

这两场游街示众的，例为“地富反坏右”，外加“被打倒的”中小学教师。私塾先生场场不落，不堪凌辱，撞墙自尽而未遂，只落得头破血流。那天劫后河边清洗，自己将碎渣取出，不料感染化脓，旬月不治，幸亏乡村郎中草药煎敷，这才慢慢痊愈。

曾几何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可雷公地母啊，你去问问天，你去问问地，你去问问这些膝盖疤痕累累的鬼怪们，是耶？非耶？

你的魂灵向水，向草木

远远走去了的时候，  
我们召唤你的魂兮归来  
居住下去，生活下去  
你的魂灵向太阳，向朝霞

远远走去了的时候，  
我们召唤你的魂兮归来  
居住下去，生活下去

这印度古诗的咏叹，唤不回屈死的魂灵。老人一双儿女，一死一逃。死者是女儿，“大跃进”时饿死，墓木早拱；逃者是独子，一走渺无音讯，终不复还。他们因受父辈牵连，未曾婚配，生命尚未开始，便已告别人世。老伴不忍，跳井了却，留下他孤身应对这个邪恶人世，晚年在贫苦中走完苍凉人生。

走笔至此，泪已沾襟，不禁长啸：三山五岳啊，雷公地母啊，地藏王大仙啊，观世音娘娘啊，诸位佛祖老爷啊，你们说，你们说，多少私塾先生，生受伤痛，老来无声，逝去无痕，谁还他们一个公道！？谁还他们一个公道！？

世界如沙，落叶无声，又是黄昏，仿佛四野哭声，但见漫天冤魂，一阵寒颤。

观北京街头又现文革大字报，竟然声称“文革是人类文明的灯塔”，不禁感慨人性幽暗。极左势力邪恶，唯赖启蒙防范，遂奋笔疾书，草就此文，以祭奠那些屈死的在天魂灵。 ❷

[【返回目录】](#)

## 李夏恩：孩子们，你们要听话！

[ 李夏恩《凤凰周刊》记者，《新京报》特约撰稿人，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编剧。本文转载自 2017-06-02《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

从孩子的眼睛里可以看到纯真，但在我们那个时代，纯真意味着能够被欺骗。

—— 汉娜·阿伦特



希特勒的孩子们，

希特勒在 1937 年的演讲中对这些站在他面前举臂敬礼的孩子们说：  
“就像你们今天站在我面前一样，几百年后，年轻一代也将站在未来的元首面前，  
表达他们对德国——我们通过斗争而获得的德国的信仰”

“我还记得，当我执勤结束的时候，每次都要为我们爱他胜过一切的元首三呼‘万岁’。情况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爹亲娘亲都不如元首最亲。”

很多年后，卡尔·海因茨·杨森，仍然会重温那个“美好时代”，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身穿着褐色的制服，像一名真正的军人一样手持不能发射子弹的长枪，守在岗位上岿然不动，他们的心中有着崇高的愿望：为了元首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带给人荣誉感了。在希特勒少年团和青年团里，每个人都在元首慈爱而坚定的目光注视下，感到充实而满足。

而在另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同样有一群孩子为伟大领袖高唱颂歌。每天，在他慈父般大名的歌颂声中醒来，对生活在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的儿童来说，乃是一种荣耀。举首四望，到处都可以看到伟大领袖如何爱护儿童的慈父形象，“他的画像每天都会出现在苏联报刊上……时而是在少先队员的簇拥下，时而是怀里抱着他那位 10 岁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乡下的图像”，这些形象深深地映入了孩子们的心中，在那个时代，有谁会不知道下面这个人所共知的故事呢？在一次休假后，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驱车经过高加索里维埃拉疗养院，遇到一批儿童，他停下来，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温存的谈话，把

他们带到一个小货摊，请他们吃糖果。



苏联宣传画，是斯大林给苏联儿童带来幸福生活的

如果把《耳语者》和《希特勒时代的孩子们》放在一起阅读，有时会产生某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元首和领袖慈爱护佑下的儿童茁壮成长，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和伟大理念的接班人，而孩子们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从小为之奋斗，这就像是一个完美的契约，看起来天衣无缝，民众从小就被培养与领袖和元首为国家擘画的目标步调一致地前进，那么，按理来说，他们所宣扬的美好未来也将会随着这些孩子的长大而到来。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但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些都不过是一个幻象，那些宣传口号中的内容从来没有实现过，但在那个时代，这个幻象却清晰而顽固地渗入到儿童的骨髓里，问题也许恰恰在这里，孩子们是如何被一步步陷入这种幻象之中的？

## 1 第一堂课：诱导

对很多苏联孩子来说，第一堂课学习俄文字母，并不是从“a”开始学起，而是从“S”开始学起，因为它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名字的头一个字母。

第一堂课对孩子来说尤为重要，它意味着在孩子头脑中留下第一印象，第一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苏联的儿童教育者对此心知肚明。要把伟大领袖的形象深深铭刻在孩子们的心中，就必须抓住这一机会。就像一首苏联颂歌中所高唱的那样：“当我的孩子开始呀呀学语的那一刻，他喊出的必定是那个响亮的名字：斯大林同志”！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随时准备为元首而死。  
将领袖的生平和事业塑造成道德楷模，使孩子自愿服从并且效仿领袖，  
正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

第一步诱导往往就以这种第一印象的方式来完成。它的目的在于先入为主地将一些意识形态的基本元素，譬如政党和领袖的名字根植在孩子的头脑之中，让其无法忘却。这就构成的洗脑的第一步原材料。但此时，孩子们只是知道领袖和政党的存在，并且感受到它的无所不在，却难以对其产生具体的印象，所以第二步，是对这些原材料进行加工，通过种种手段强化儿童对这种印象的认识。

最初的诱导往往是毫无恶意的，甚至是令人心身愉快的，孩子们会聆听到一系列关于领袖的个人美德、对孩子的爱护以及国家如何为孩子们创造美好条件的例证。在一本名为《苏联少先队夏令营》的书里，作者告诉教师和指导员们“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用列宁、斯大林卓越的一生和事业的范例来教育少先队员和小学生们”。

为了达到目的，这种教育手段也应当根据儿童的心理循序渐进的。小学三年级（九到十岁）的孩子认识列宁、斯大林的生平和事业，主要根据课本上的内容；四年级则要学习苏联的历史教程，“使他们能够结合历史的事件更充分地来认识伟大领袖的生平和事业”。到七年级才开始学习苏联宪法。这一切都是根据“儿童们所累积起来的知识水平安排自己的工作”。

诱导的过程可以通过很多手段，但倘使这种意识形态仅仅是通过讲述被灌输进儿童的头脑，显然是不明智的，很容易使儿童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最佳的方式是诱使儿童相信这一意识是由他自己发现的。因此，座谈会和讨论会就成为诱导的必要步骤。一场成功的座谈会的形式看起来是相当自由和民主的，充满了愉悦的气氛，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实际上，这些观点早已被限定在一个严格的框架内。因为这些座谈会的题目都是被精心设计的，比如“列宁是怎样学习的？”、“斯大林是如何给我们带来幸福的童年的？”“斯大林是如何忘我地为人民服务的？”

主题既然已经被限定，那么参加讨论的孩子们所能做的，也就只是证明它是如何的“正确”。老师会鼓励孩子寻找“正确”的例证，而对那些异见不同的观点却会加以打压和批评。在赞扬和批评之间，学生肯定会选择赞扬，他们会在这一过程中学会如何揣摩上级的意旨，并且做出符合这一意旨的回答，最初的服从，也就由之形成了。

尽管服从乃是培养孩子的目标之一，但仅仅是“为服从而服从”仍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孩子们必须要知道服从的对象是绝对光荣、伟大、正确的，才可以断绝自己内心中怀疑的一面，由服从上升为自愿的献身。

“利用伟大的领袖的生平和事业的范例告诉少先队员，必须在自己身上培养出那一些必要的品质，怎样才能无愧于少年列宁信徒的称号”。恰如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必要的品质”，也就是美德，同样也存在于教育手册中，无论是纳粹党少年团的手册，亦或是苏联少先队的规章，如果单是翻看内容，很难不让人相信这是一个道德完美的人所必要具备的品质，正直、忠诚、勇敢、无私。这些形容美德的词语在教育中几乎俯拾皆是。但实际上，这些词语尽管还保留着字面，但内容却被巧妙地改造了。正直意味着为了更高的真理可以出卖自己的亲友，或者叫做大义灭亲，这是党所宣扬的社会责任感；忠诚意味着对领袖毫无保留的热爱和对上级的无条件的服从；而勇敢则是那个时代口号一样：“时刻准备着！”随时为党所提出的号召献身。

美德被扭曲成意识形态的装饰品，仅仅保留着它的词语，即使是善恶也从一开始就被划分为简单的二元对立。社会群里被简单地划分为斗争中的“好人”和“坏人”。在纳粹德国，好坏是按种族划分的，在纳粹德国一本普遍发行的儿童读物《毒蘑菇》中如此写道“有好蘑菇，有毒蘑菇。有好人，也有坏人。犹太人就是坏人。”在苏联，好坏则是根据阶级来划分的，宣传品告诉孩子们，“暗藏的敌人”时刻存在，资产阶级、富农、沙皇的支持者、西方敌对势力……这份长长的名单使孩子们相信，完成美德之一的方式就是揪出、驱逐甚至杀死这些“坏人”。

在纳粹德国，少年团的孩子会在篝火晚会上焚烧犹太人的模拟像，或者干脆加入到冲锋队打砸抢犹太商铺的行列之中，为“纯洁种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而在苏联，玩内战和征收粮食的游戏是一种时尚，孩子们在游戏中会为争当布尔什维克：“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有人愿意当白军和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

什维克。”

但这些美德中，最重要的是“无私”，这一词语出现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被升华为最高的美德，像是勇敢、忠诚、正直都可以被统一在这一美德之下。因为它代表了意识形态的最终目的，也就是消灭自我，将个人全身心地融入到集体之中。诚如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 1918 年所写道的这样：“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或者像是纳粹少年团的口号：“毫不为己，一切为了德国。”

这一意识形态之下，拥有自我，或者说是私心乃是最大的罪恶之一，一切恶都是从中生发出来。一个无法融入集体的人是可耻的。只有追随大多数人的行为才是正确的。集体制造了一种平等的幻象，让孩子们相信，只要加入集体，一切差别都被消灭了：“他们穿着同样褐色衬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不会有人去问。他们看上去完全一样，就好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有产者的儿童，无产者的儿童，从前资产阶级、企业家的儿童，农民的儿童，等等，但外表上看起来大家都是一致的。”

集体的仪式、合唱、游行，等等集体活动将个人完全融入到集体的海洋之中，个体在这个庞大的海洋里是渺小的，他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加入到歌颂领袖的伟大合唱之中，为这个政权贡献自己的美德、信仰，甚至是生命，从作为一个个体的孩子，到一个集体中的人，诱导的过程就这样循序渐进地达到了它的目的。它看起来每个步骤都显得光荣正确，完全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进行的，但潜伏其下的，也有其晦暗的一面，那就是孩子们需要学习的第二堂课：恐惧。

## 2 第二堂课：恐惧

“我们从小就学会了闭嘴。‘舌头会给你带来麻烦’——这是大人一直叮嘱我们孩子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一直害怕发表意见。妈妈常说，两人之中必有一个举报人。我们害怕邻居，特别是警察……即使在今天，我看到警察仍会怕得发抖”。

恐惧与诱导之间的区别是，后者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应该做的，而前者则是告诉还是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比起诱导，恐惧实际上能在孩子的头脑中产生更大的影响，让他们去自觉规避某些事物，从小在头脑中筑起一道禁忌的堤坝。

在纳粹德国，低劣种族即是禁忌之一，对元首的不敬同样是一项大忌，任何怀疑帝国意识形态的行为都是禁忌；在苏联，“坏”阶级，任何损害伟大领袖名誉的行为，对党的非议等等，每个孩子都知道触碰这些行为的下场将会如何。那是最严厉的惩罚在等待着他们。

其中一个惩罚就是被孤立，逐出集体。在一个政权掌控了所有社会资源的国家里，只有加入集体，才会拥有生活的可能。因此，逐出集体就成为了对孩子来说最严重的惩罚，他会受到同学的轻视、朋友的孤立，谁也不再理睬他，谁也不会再帮助他，轻视和冷漠使他被开除出整个社会之外，无从立足。一个叫格尔特·埃克哈特·洛伦茨的人回忆自己在波茨坦国家政治教养院的上学生涯说：“落后者的名字会

在饭前点名时被公开点名，不服从的人要遭到公开谴责，谁要不是‘战友’，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就要遭到排斥。”班上的同学会故意不和这样的人说话，完全不理睬他，以作为惩罚。



苏联宣传画：《少先队员要讲真话，维护集体荣誉》  
一位少先队员站起来检举同学的错误行为，告发成为了一种美德，  
在宣传画中墙壁上贴的画像正是因揭发自己富农父亲而死的少年“英雄”莫洛佐夫的画像

在苏联，除了遭到谴责和隔离之外，这些沾染了禁忌的孩子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下场：“被消失”。这种消失有时是不明显的，只是在第二天上课时，教室里又多了一张空课桌，而老师不会告诉同学们他们昔日的同桌为什么没有来上学，学生们当然也心知肚明的不会去问这个明知故问的问题，以免他们会成为下一个。有时，这种“消失”为了起到震慑作用，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尤金·叶尔钦在《打断斯大林的鼻子》里讲述了这种被迫视而不见的恐惧。国安局的秘密警察就在教室门口徘徊，学生们甚至可以听到皮靴踱步的声音，然后一个学生被叫出来，这是老师最后一次呼唤他的名字。接着，老师熟练地命令学生们用一支笔，把班级合影上那个同学的脸涂黑。

禁忌是如此地让人恐惧，所以一旦自己沾染上这些禁忌，唯一的方法就只有通过更严格的考验来洗脱自己的罪行。苏联的少年英雄巴甫列克·莫洛佐夫是个典型的例子，根据官方的文宣材料，他的父亲属于一个“坏阶级”富农，而他向警察检举了他父亲，也因此被“富农反革命”一家杀害。苏联的文宣机器很快将莫洛佐夫塑造成大义灭亲、正直忠诚的道德模范。高尔基呼吁为他修建一座纪念碑“血

亲可能是你的敌人，不能放过这样的敌人”。

在整整一代苏联儿童的心里，莫洛佐夫都是完美的少年英雄。他不仅仅提供了苏联式美德的典范，更给予那些生活在禁忌惶恐中的孩子们自我救赎的可能。一场学习莫洛佐夫的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一位叫亚历克山德的少年揭发了他父亲，并且请求逮捕他的父亲。而另一个来自克列缅丘格附近的16岁犹太男孩，则在自己父亲的坚持下，给当地的报纸写信，公开声明脱离自己的家庭：

“我拒绝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我觉得，真正的父亲是共青团，能教我生活中的大事；真正的母亲是我们的祖国，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联人民才是我的家人”。

恐惧就通过这种方式转化为一种新的诱导。为了符合美德的标准、融入集体而牺牲家人的行为是值得赞赏和鼓励的，这也是为何意识形态在撕裂这些孩子的家庭同时，也赢得了他们更为坚定的忠诚。因为他们通过这种毁灭个人情感的方式，在这个政权下达到了“新生”，他们因此洗脱了罪名，并且获得了政权的宽恕，被重新接纳到集体之中。而他回到集体后所享有的“正常人”的待遇，则进一步让他深信自己检举揭发父亲亲友的行为是正确的，他也因此经受了比一般孩子更严酷的考验。

为了保住自己牺牲巨大所得来的“荣誉”，这些人往往会更加成为这一制度的捍卫者。一位叫奇拉·柯尼燕科娃的女士，在斯大林死后三十年里仍然自称“斯大林的爱人”，但她的两个叔叔都因为“怠工”的罪名被抓进劳改营，但这却使她更深地挚爱斯大林，这位“赏罚分明的公正的伟大领袖”，这看似无解，但却合情合理，她为了融入这一体制付出的牺牲太大，以至于否定它，她所作出的全部牺牲就毫无意义，也就彻底否定了她自己。因此，她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童年时代里——时刻准备着为了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伟大时代。

### **毕业：长不大的“新人”**

“我们必须教育出一种新人，从而使我们的人民不会因时代的衰退而灭亡。”

“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

元首的意旨和伟大领袖的口号交相辉映，他们都渴求将孩子塑造成符合他们意志的完美“新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目的达到了。通过诱导与恐惧的双重手段，一个懵懂的孩童是完全可以被培养成合格的“新人”的，无论是出于对荣誉感的热望，还是出于对禁忌的恐惧，他们都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让自己相信意识形态下的宣传是合情合理的，毕竟，融入集体，将自己奉献给这个制度，是他们唯一可以有的选择。

但当他们长大，进入成人社会后，却发现一切都与他们所受过的教育全然不同，这个国家并不是处处美好，等级森严，官僚严重，缺乏活力并且死气沉沉，还有萦绕四周的恐惧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他们自己也可能成为被告密的对象，也会因为一语有失而进集中营。但问题在于，尽管他们可能在真实的生活中发现了虚伪的一面，但他们的大脑早已在童年时代被灌注了意识形态，他们习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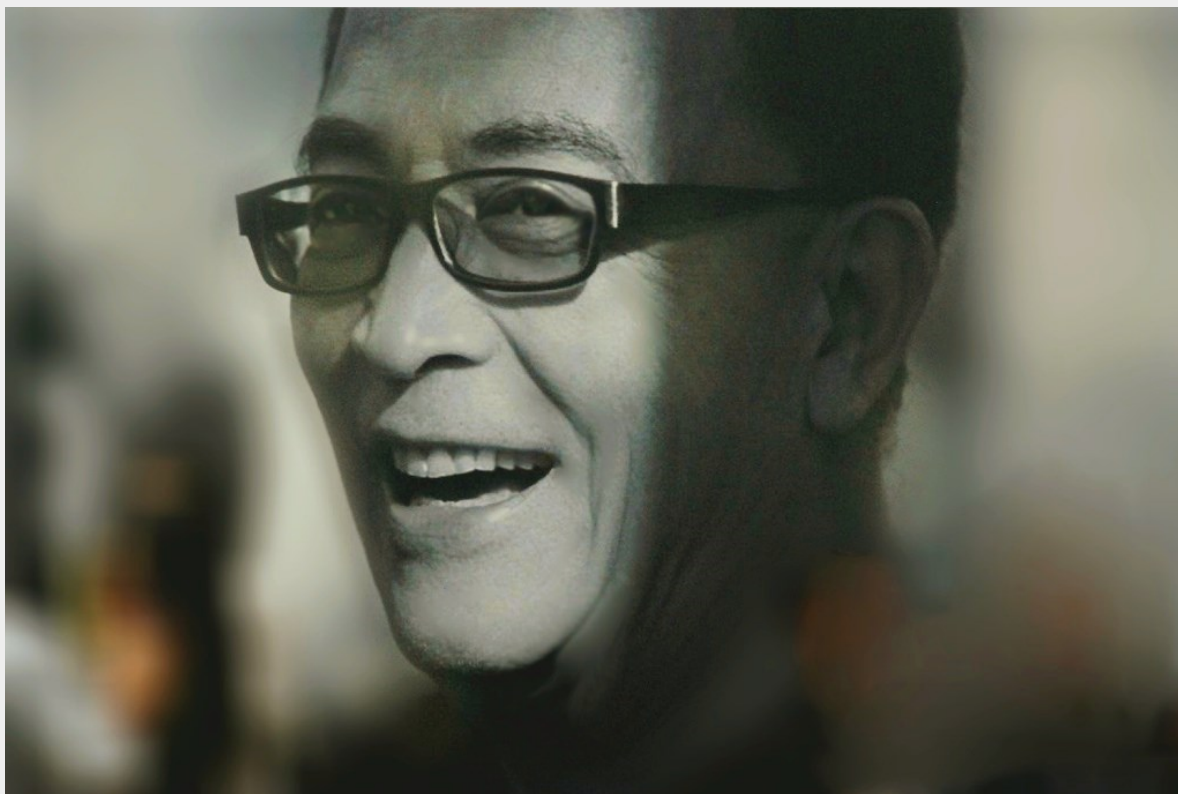
于那种话语,习惯于那种表述方式,更习惯了那种思维——这些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他们的头脑中,因此他们只能按照这种模式来为人处世,这也是他们与社会互动唯一方式。当他们遇到难以解释的困境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回归到领袖和元首那里,回归到他们所习惯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求公正。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童年——他们都是“好孩子”,都深深地理解如何“听话”。但成长的意义正在于如何自我思考,而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另外一堂课了。■

[【返回目录】](#)

## 张郎郎：在死刑号的日子

[张郎郎 作家、画家、自由撰稿人，196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研究员，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外交学院教授。本文首发于2010-04-14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实习记者覃宪秋。图片与说明为中评周刊编辑所加，转载请注明]



本文作者张郎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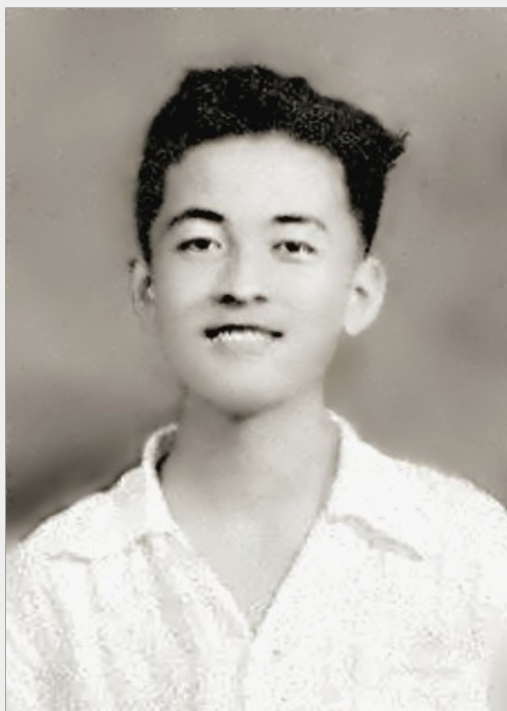
生于延安，国徽设计者张仃之子，  
文革初期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入狱，  
曾被判死刑、与遇罗克同关一监室，10年后大难不死出狱

2月，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辞世，儿子张郎郎从普林斯顿大学飞回奔丧。谈论生死，共话往事，原来这个还有些英俊的、喜欢说笑话讲故事的老头儿，曾经是诗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罗克在死刑号的狱友、陈丹青的教员，并与国内地下诗歌运动渊源深切。

1943年11月，张郎郎出生于延安，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在像“育才”、“一〇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那个饥饿而又狂热的年代，无数少年被压抑住的光芒，他却轻轻巧巧、活活泼泼地如数绽放出来了。

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张郎郎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秘书、国务院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

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他们享有的书籍、画册、电影等“精神资源”则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



学生时代的张郎郎

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4年，有关方面发现“X社”策划到法国去，马上实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时间。1968年，他被隔离审查、毒打，最后坠楼而死。据称死时身体仍绑在椅子上。

“太阳纵队”的命运不比“X诗社”强多少。

张郎郎因言论罪被抓捕，最后被判了3条罪名：“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小道消息”；“里通外国”，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

就这样，他进了死刑号。

后来张郎郎撰文回忆：“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说’，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奢望。

和“太阳纵队”沾边的人，都被批斗、关押、审查。和张郎郎接触较多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结束，张郎郎获得平反，死里逃生。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两年书之后，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后去了美国。

他成了一个流浪者。“我的心最宁静的时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动旅行，还是被动逃跑。”

期间，张郎郎曾在深圳驻足。写作的欲望蠢蠢欲动，一气儿写了几篇东西。同时，和日本人合编有关中国商业法律的书。每天，他背着手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两个打字员就疯狂打字记录。上半天，找3个人的饭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梦。

在美国时，他曾和两位朋友商量，每人出两万美金，在纽约上州买一个老农场，在那里当专业作家。没事儿就使劲写，写累了就去干农活儿，“锻炼身体的功夫，就生产出每日的粮食”。

两位朋友兴奋万般，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么上班，怎么上学？谁陪你们疯啊？

不管怎么说，张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块大自然中的、属于我的土地。我将和它血肉相连。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么一块地，你可以从心底自然地、实实在在、时时惦念着它。”

如今，那么多年波折磨难过后，他还会不时笑出声来。到处有人请他喝酒，健康自在地游历，时不时揶揄荒诞的时光，这是岁月给他的最大的优待。

### **“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

“太阳纵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个诗歌沙龙。后来，郭路生和另一个朋友郭大勋也加入了。那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他们还是中学生。郭路生很朴实、很谦虚，觉得我们已经算诗人了，很愿意跟我们玩儿，我们就觉得他太小--谁也没想到他以后会变成挺有名的诗人。后来他写了《鱼儿三部曲》，我看了就觉得，哎，这孩子真有点儿灵气。他也特高兴，觉得找到了诗的感觉。

“太阳纵队”还有我的弟弟张寥寥。他跟芒克、北岛他们都是朋友，一块儿写诗，还有鲁双芹。我被抓到监狱后，他们又组了一个沙龙，现在有名的诗人基本都在那里。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们同一拨开始写诗。

北岛初期的诗歌，像是格言体，有些愤怒，要讲一些深刻的话语。北岛会写诗，但他是个老实人，特木讷。我们搞活动，一般要有北岛的诗，他是个符号人物嘛，有人会说：“郎郎，北岛的诗你来念吧，他念没劲。”北岛也没辙。我们是好友，但也不客气，说，这么有名一个诗人，一不会浪漫，二不会幽默，好像惨点儿。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缉令出来以后，我就决定离开北京了。有一阵藏在石油学院附中，郭路生经常到我那儿去。一次他和另一个诗人王东白一块儿来。王东白拿来一个本子，让我给他写首诗带走。我正要逃跑，哪有灵感啊，我说，就给你们写个题目吧，就写了“相信未来”。后来有一次聚会，

郭路生还说那个本子应该给他，因为最后是他把这个题目写成诗的。现在也不知这个本子藏哪儿去了，也许王东白还留着。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后，他们也被抓了，后来精神都有点儿不太健康。

我离开北京前，郭路生和一个朋友非要送，约的是在北海见最后一面，喝杯啤酒算是告别。但我没去。满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标语“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点儿不太现实。后来郭路生的朋友回忆，他们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没有出现。其实我已经跑了。

通缉我的原因一是“太阳纵队”这个组织，还有一个，是我爱给“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多为高干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其成员，被判定为反革命组织，遭到打击。）那些小孩讲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那些小道新闻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小联动”到处去散布，江青很愤怒，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查到背后有大学生，说我是“联动的思想后台”。实际上我只是教他们念诗、唱歌，之前他们接触不到那些。现在，都过去50年了，当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词他们还背得下来。

通缉令出来时上面有我的两寸照片。一夜之间，被北京的“联动”全都划拉下来--就没有照片啦，上头非常愤怒。后来想想，这种古典的情义，现在这个物质社会是不会发生了。《血色浪漫》跟我们那故事比差远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因为牵扯到很多意识形态。

我就和女朋友蒋定粤（抗日名将、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后嫁给万里之子万季飞，生有女儿万宝宝，现定居美国。）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个好地儿，就藏在龙井村，真正产龙井茶叶的地方，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全国那么多村子，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村子里？

蒋定粤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她怕父母不放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现在很安全，在什么什么地方。她母亲觉得我们在外边跑不合适，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的，就回信说，你们俩结婚，免得别人说话不好听。我想，没有家里人来参加也不能随便结婚，5月1号，找一些朋友作为证人订了婚。

我们以为通缉我们的就只是“联动”的敌对派，没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马上被他们拿到，按图索骥，5月14号就把我们抓了，最后婚也没结成。

被抓回来前，全国为这个案子抓了没有1000人也有几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为我逃到国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说的，全都说是我说的，我被抓进去时已经不需要我的供词了。“这条说过没有？”

“好像没说过.....”打！“说过说过.....”当时讲3条攻击中央首长的就可以判死刑，给我弄了100多条，够枪毙几十次了。

他们来审我和“老七”，清楚地说，那么多反革命谣言，你告诉我们谁告诉你的，你就是造谣者；找不出造谣者，那你就是造谣者。造谣的罪行跟传谣可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会判死刑，觉得要是咬出别人这辈子良心过不去，反正我们是俩学生，顶多判个10年，不约而同咬定是自己编的。

## 马列原教旨主义者遇罗克

1968年6月被关进牢里。

关在我旁边那个人是个“历史反革命”，瘦得很。我刚进去，他就跟我说，你要没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该招就招，因为你受不了刑。我说，好，知道了。结果没两天那人就被打死了，报上去说，这人是自杀。他有了这个经验也没用。



**遇罗克** [1942.5.1—1970.3.5] 生前最后一张留影，

文革期间因言论被判死刑的青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第六十五中学，做过学徒工、代课教师，文革初期因写著名的文章《出身论》于1968年1月5日被捕，1970年3月5日与另外19位“政治死刑犯”同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死时不满28岁

那年10月或11月开始和遇罗克关在一个房，到第二年5月，差不多一块儿关了半年。我们是两个阵营里的人，关在一起是有意让我们在争斗中互相揭发，因为我们24小时在对方视线里，比夫妻还亲密。

遇罗克身高一米七几，有点罗锅，深度近视，微微谢顶；后脑勺很大，从侧面看，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或一个大冬瓜；长手长腿和大螳螂似的，动作可笑。别人笑他，他也一块儿笑。一看就知道他是很聪明的人。

遇罗克笑眯眯走过来：“听说你是中央美院的学生？咱们认识一下。我叫遇罗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一走字的遇，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

我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他父亲是“右派”，学习再好他也考不上大学，就感觉这社会不平等。而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美院负责人，没被打成“右派”过，但“文革”受冲击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他当年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只要坐过国民党监狱的都是“叛徒”，反正所有罪名都有了。如果他没出事，我可能也不至于进监狱。

熟了之后，遇罗克说，一听我要和他关在同一个房他特高兴：过去在社会上竞争不公平，现在终于平等了，都是犯人。很多干部子弟在外边趾高气扬，他想看看谁厉害。所以一开始他对我不算友好，只是好奇我为什么会被抓进来。

他以为我肯定是血统论的支持者。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没同意过血统论。他很意外，问为什么。我说我看过一部德国电影，讲的是二战之前德国排斥犹太人的情况。血统论跟德国法西斯排犹没什么区别，印度用种姓划分人的高低都是错的，现在要以出身来划分，不是倒退了吗？这成了他和我化解敌对情绪的转机，但他还是半信半疑。



**郑晓丹** [1947—1968] 北京地质学院附中高三学生，

文革初期因公开支持和捍卫遇罗克《出身论》的观点、反对血统论、主张维护人的尊严和平等，  
1968年4月26日被隔离审查，在遇罗克被捕后半年的1968年6月6日深夜，  
郑晓丹被政工干部五花大绑从四楼的窗户推下摔死，牺牲时年仅21岁，  
杀害郑晓丹的凶手至今未缉拿归案

然后，他就跟我谈人的哲学思想和基本框架。我发现他其实比我马列主义得多，他相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我说，你说的那些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我们都看萨特、存在主义。他根本没听说过，在我解释之后说：这叫什么哲学！这是一帮法国小知识分子的狂热！你根本没有真正读懂过马列。要是想真正了解马列主义，我可以给你补课。他的意思，他是捍卫革命理想的人，马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

所以我们没有变成敌人，而是变成了思想辩论的对手。他发现我并不是个以革命贵族子弟自居、被惯坏了的红孩子--他后来和同一阶层的犯人聊不到这层次。

当时牢房里很多来自底层的犯人特别崇拜他，觉得他代表他们的利益。我去之前，遇罗克已经给他们办班，普及马列基本原理。我们辩论一紧张，他们以为我们要打架，想收拾我。遇罗克就说，“算了算了”。

牢房有个老干部有一部延安时期出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出版的改了很多。他是个老红军，知道我是延安生的。遇罗克就说：“你跟他借，他肯定借给你，他不肯借给我。”我就跟老头借，悄悄给遇罗克看。他认真地把两个版本的差别全记下来。



右为遇罗克父母，左为郑晓丹父母

1980年10月，遇罗克的父母得知郑晓丹事件后，特意从北京赶到郑家探望，照片是两家父母在郑家为儿女开家庭追悼会时的合影

在牢里都要学《毛选》。我俩挨着坐，一人一本《毛选》，好像在读，其实在说话。有时其他犯人知道我们要交谈，就把墙角看守看不到的座位换给我们。

监狱里的营养是不够的。北京的条件已经比外地好很多，也就是早上两个窝窝头，下午两个窝窝头，偶尔有点盐水煮的菜汤。极度饥饿中，见到任何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东西能不能吃啊？抓到壁虎，大家立刻问：“这能吃吗？”要是鸟飞进来那肯定要吃掉的，老鼠也一样。但那么饥饿的时候，遇罗克照样聊形而上。

他的预审员外号叫“丁大个儿”。他说：“遇罗克是个花岗岩脑瓜儿的狱油子！”因为他简直是一个讼棍：了解中共的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所以往往能找出预审员违法、违章的破绽。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背景、性格、脾气，还帮助犯人应付提审，免费当律师。

我和他订下合同：每天休息时间，轮流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题目，讲给对方听。我给他讲“西洋近现代美术史”，抽象派、印象派之类，他全背下来。他给我讲“世界电影现状”，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说你又不是学电影的，怎么知道那么多？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房从别人那儿换来的。他一直在学，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知识。但我给他讲《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在路上》，他越听越不高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他特别天真，特别爱幻想。有人告诉他，陈毅看了他写的东西，觉得不错。他就给陈毅写了封信，托弟弟妹妹交给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后来他了解了我的案子，说：“你的案子很复杂，等我出去了，帮你去找找陈毅。”

当时我们把可以想到的最重的罪行都加在一起，也没想过对方会被判死刑。客观地说，遇罗克根本不用死，他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经常跟我说，他最喜欢的诗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有种盗火者的心理，觉得像他们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牺牲的勇气。他想做这样一个先例。

### 随时会被枪毙的爱人

我们一起呆了半年，1969年夏天，被分到不同监狱。1970年2月9日大年初四，又一起到了死刑号。

那天晚上，我以极快的速度，在脑子里把一辈子的经历过了一遍。也许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场了，现在不想，以后就没机会了--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死刑号里，每个人都是单间，见不到面，只能通过声音交流。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处在一种强烈的震撼中，竟然用开晚会的方式抵御恐惧。检查的人来了就装睡，走了我们就小声地哼唱。我唱了苏联歌曲《光荣牺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一时之间，一股热血冲到胸前，我不能自己地用意大利文高声唱道：“哦，我的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

没有人睡觉，因为不久就要长眠了。我们平静地聊着各自的案情，有人忽然说，“要是家里人知道咱们最后还开了晚会，乐乐呵呵的，那就好了。”于是我们挑了个最有希望活下来的孩子，让他出去后把最后的晚会的情况转告我们的家人。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还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我马上明白了：杀鸡儆猴嘛。

那阵，每天除了睡觉时可以短暂地忘怀，醒来一刹那，看到阳光，喜悦了几秒钟，立即明白，我是一个随时要被枪毙的人。

睡着也是在做噩梦。黑暗中，被横七竖八的水泥、钢铁碎块夹在缝中，被漫上来的地下水渐渐淹没、窒息，无法逃脱。那种痛苦是非常具体的。

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寿（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说，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很多人在垂死挣扎。有人向上面报告说有祖传的秘方要献给国家。写完了交上去，他又报告了，说胃寒的病人才能吃，胃暖的不能吃，就怕弄错了到时候更不行。我们就想，这完全是生死一线的事。有的人当时就疯了，也有可能是装疯，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求生。我当时想，一定不能让人觉得我有多

惨，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微笑，优美地走完那一步，保留最后那点尊严。

死刑号里有一个女囚叫孙秀珍，长得很美，温柔优雅、毫不张扬。她曾嫁过一个男人。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挑花厂当厂医，认识了同是厂医的田树云。田树云展开激烈的追求，立誓娶她。她和丈夫离婚，厂里家里骂声一片，田树云却跟另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文革”中，田树云日子不好过，又来找她，说他已经和苏联接上头了，让她帮他定期把信投到苏联使馆的汽车里，以后一起远走高飞。孙秀珍投了19次信，最后两人双双被捕。

还在监狱学习班时，我就被她迷住了，开始给她写情书。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在倒土时用图钉把情书钉在装土的箱子下面。

她写给我的情书也很热情。我们都知道这种爱没有任何结果。她比我大，还有个孩子--我出来了才知道。她跟同房的李世佺说过，就算我们出去了，郎郎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也不会娶我。

但当时我们觉得，至少还有人爱你，是很大的安慰。

现在我们已经是死囚了，她给我的感觉是心如止水。

她被枪毙的前夕，我们作为同一场批斗的主角，终于有了一次肢体接触--之前我们写了那么多的情书，却没有机会相互触碰--那是在去体育场参加批斗会的车上。我们背靠背坐着，尽量地贴近对方。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惟一的甜蜜。后来我跟北岛他们讲这件事，他们说，这是生命和钢铁机器在作不对等的抗争。

孙秀珍，这么美的女性，连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完全是被无谓地牺牲了。像这样傻乎乎的女孩子，在那个时代死了千千万万，没人为她们说话。最惨的是，李世佺出来以后，去找孙秀珍的父母，说可以申冤。她的父母不同意，说这是个耻辱，我们要永远忘掉。如果我不提，你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孙秀珍。

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你牺牲了，当时很多人哭了，完了大家都要过自己的日子，谁还会记得那些死的人？只有他妈妈爸爸才知道。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就被牺牲掉了。

我坚信的一点是，要抵抗暴力、抵抗丑恶，而不是比它更厉害，否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得暴力、变得丑恶。

你就喜欢那个美的东西，别弄脏自己。你老是要跟它斗争，最后会发现你和它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了。

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 “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

监狱里每年都有一个节目：过年前一天有个宽严大会，枪毙几个，或者提前释放几个。1977年12月31日，正在牢里分糖吃，监狱的人对我说，我可以回家了。

我到门房脱下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到了门口，看到一辆吉普车，哥哥和母亲站在那儿。我说，你们已经来很久了？他们说，来了一会儿了。没人哭，也没人说那些伤感的话。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说：“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说：“没事儿，挺好看的。”

到了家门口，我爸来开门，说：“郎郎回来了。”我爸妈很细心，给我收拾了一间屋子，里面是素色的。还买了个砖头式的录音机放在那儿，有两盘俄罗斯民歌的带子。说：“你先躺躺，休息休息喝点儿水。”就这么到家了。电视剧里应该抱头痛哭，我们家没这事。

刚出来的时候不适应的太多了。晚上睡觉，我妈过来看，要给我关灯。我说别关，我10年没关过灯了，突然黑了会不适应，觉得一下陷入深渊。

出门根本不会过马路，而且不习惯后边没有人跟着。在监狱里你到哪儿都有警察跟着，觉得他们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突然没了，空荡荡很奇怪。

我变得不怎么会说话了。其实在监狱里经常跟别的犯人聊天，只是语速和说话的内容跟外边完全不一样。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饭，他们说那会儿我面色苍白。

好在没过多久又没事儿，变回来了。

出狱两年之后，1980年，我就离开了中国。原因特别简单：这批案子的几百人到公安局要求销毁审讯记录和档案，就我和“老七”的他们不肯销毁，说是我们并非“判决无罪”，而是“证据不足”。那意思就是这案子还没结。我们当时也想不到中国变化那么迅速，要是过几年又折腾一回呢？就决定，为了安全，合法地飞走。

当时很多人出去都是为了安全。出去后大多数人都过得不行，靠各方面的救济，后来允许回来，又大批跑回来。我属于特别能谋生的人，能混入各个大学去教书。一次北岛来普林斯顿，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演讲，他讲的是流浪者的心态。有人说，“你到美国了都有饭吃，多好啊。”他就说，“你不明白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很艰难，活不好。后来“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马波）他们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回来？就是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是这样。■

[【返回目录】](#)

## 贝蒂·约瑟夫：“客体关系之母”梅兰妮·克莱茵的原生家庭与她的个人发展

[贝蒂·约瑟夫 梅兰妮·克莱茵基金会。本文转载自 2016.06.27 世图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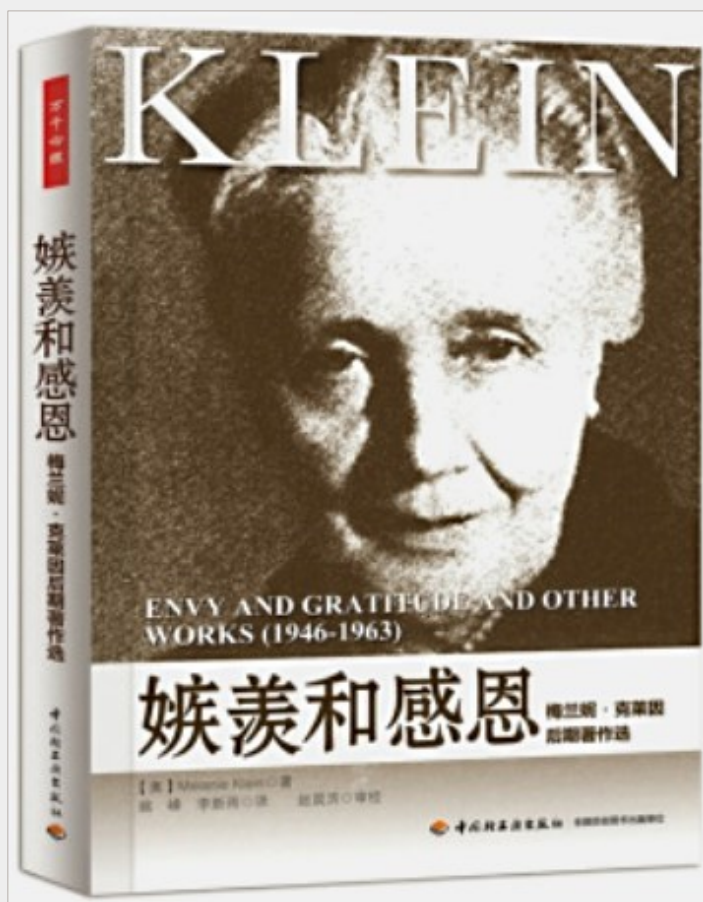


**梅兰妮·克莱茵** [Melanie Klein 1882.3.30—1960.9.22]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  
被誉为继弗洛伊德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最具贡献的领导人物之一，  
百年来无人超越其成就

梅兰妮·克莱茵，1882年生于维也纳，虽然她在那里生活到19岁，却是在1910年搬到布达佩斯以后，才真正“发现了”弗洛伊德与精神分析，从此精神分析成为其主要的兴趣与热情所在。而使她获得这一发现的家庭背景是有意义的。她的父亲莱齐斯（Moriz Reizes）是一位医生，其传统的犹太父母希望他能成为一个祭司，但是他默默反抗，研习了医学，并且在他买下牙医诊所之前执业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广泛地阅读，且自学了十种欧洲语言。他在克莱茵18岁时过世。克莱茵的母亲来自比较自由的家庭，似乎是一位富于冒险、温暖和勇敢的女性，她在克莱茵32岁时过世。我

们可以从她的家庭背景里看到人性的温暖、勇气，以及进步与改变的能力，这些在克莱茵日后对精神分析的贡献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嫉羨和感恩 梅兰妮·克莱茵后期著作选 万千心理》

【奥】克莱茵著，姚峰、李新雨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了自 1946 年到 1960 年梅兰妮·克莱茵过世之前的著作，

其中还包括了在 1963 年克莱茵辞世前未完成的作品，

几乎囊括了克莱茵毕生最重要的文献

梅兰妮·克莱茵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其发展上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西多妮 (Sidonie) 大她四岁、伊曼纽尔 (Emanuel) 大她五岁、艾米丽 (Emily) 大她六岁。西多妮罹患重病，她短短的九年生命，几乎都是在医院中度过的，虽然她过世时梅兰妮只有 5 岁，但是她们之间已经发展出非常亲密与投契的关系。据说她想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教给妹妹，也是她教导梅兰妮阅读与算数。伊曼纽尔在写作与音乐两方面都显露出才华，但是他罹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很瘦弱。他像西多妮一样，也看出梅兰妮的能力，并且鼓励她、支持她读书。他有点叛逆，但是交友广阔，对于文化方面具有广泛的兴趣，也引领妹妹进入了这些领域。经由伊曼纽尔，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阿瑟·克莱茵 (Arthur Klein)。伊曼纽尔曾想习医，但由于健康状况而必须放弃。在 14 岁前，克莱茵也曾计划习医，但事与愿违。17 岁时她订婚，并于四年后结了婚，因而必须放弃医学之路。不过，在订婚之后的两年里，她到维也纳大学研读人文科学。

阿瑟·克莱茵是个工程师和商人，为了工作必须时常旅行，有几年这对夫妻居住在斯洛伐克与席雷西亚（Silesia）地区的小镇。梅兰妮深深怀念她在维也纳的社交与智性生活，当时也已经出现婚姻问题。不过当 1910 年她的丈夫在布达佩斯找到工作时，她的生命改变了。当时她已有两个小孩，梅莉塔（Melitta）生于 1904 年，汉斯（Hans）生于 1907 年。在布达佩斯，梅兰妮发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梦的解析》（*On Dreams*, 1901）以及改变其生命的精神分析。她与费伦齐（Ferenczi）联系并接受其分析，费伦齐鼓励她开始分析儿童。1919 年，她在匈牙利精神分析学会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名儿童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大约在这个时候，阿瑟前往瑞典工作，她终于与阿瑟分居了，并于 1926 年离婚。1921 年她搬到柏林，在这之前她曾于海牙的精神分析年会中见过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且深深被他及其思想所吸引。亚伯拉罕对于克莱茵的工作非常肯定，她终于在排除万难之后，说服亚伯拉罕于 1924 年初开始为她分析，但是 1925 年 12 月亚伯拉罕去世了。失去了这个治疗师同时是朋友的支持，克莱茵在柏林的生活越来越艰辛了。也是在 1925 年，她认识了恩斯特·琼斯（Ernest Jones），他对她的著作非常感兴趣，并邀请她去英国演讲，她欣然答应，她在英国共进行了六场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演讲，这些演讲内容随后编辑成她的第一本书《儿童精神分析》（*The Psycho-Analysis of Children*）的前段。来年她带着最小的孩子——当时 13 岁的艾力克（Erich）移居伦敦。梅莉塔在此前已经与施密德伯格医师（Dr W. Schmideberg）结婚，夫妻双双接受训练并成为精神分析师，也定居在伦敦，克莱茵的长子汉斯则留在柏林。梅兰妮旋即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al Society*）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常态性地参与学术研讨会，在学会中宣读文章、举办讨论会与演讲。她的取向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又为其他人所高度赞许。

梅兰妮·克莱茵和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分析儿童，但是她们的工作在许多基本面向上大相径庭，这些差异可见于 1927 年的《儿童分析论丛》（*Symposium on Child Analysis*）。梅兰妮·克莱茵对于精神分析之主要贡献的根源可以说在《儿童精神分析》一书中就已经存在了。举例来说：本书显现了她对儿童焦虑的关注，这一焦虑经常伴随着潜在的攻击性。她看到诠释焦虑的重要性，而非用来忽略它。她见到儿童的潜意识幻想与焦虑事实上表现在游戏中、使用玩具的方式上以及在游戏室里的行为中，因此，接触儿童的游戏让克莱茵能够与幼儿工作，即使是欠缺语言表达能力儿童亦然。这样的取向随后开启了对潜意识幻想更多的了解，并且帮助她辨识了许多弗洛伊德曾经生动描述的议题，事实上在个体生命的更早期就已经开始了，例如与客体的关系、认同与内射（*introjection*）的过程、俄狄浦斯情结等。她见到幼童带着先前对客体已经形成的期待与态度，进入治疗中。她开始探讨内在客体的本质，以及这些客体在儿童的内在世界里是如何相互产生关联。她观察到这些内在客体运作的方式决定了儿童与分析师建立关系的方式——也就是移情。她对移情的观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投射与内射的机制，以及移情如何反映了儿童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经验之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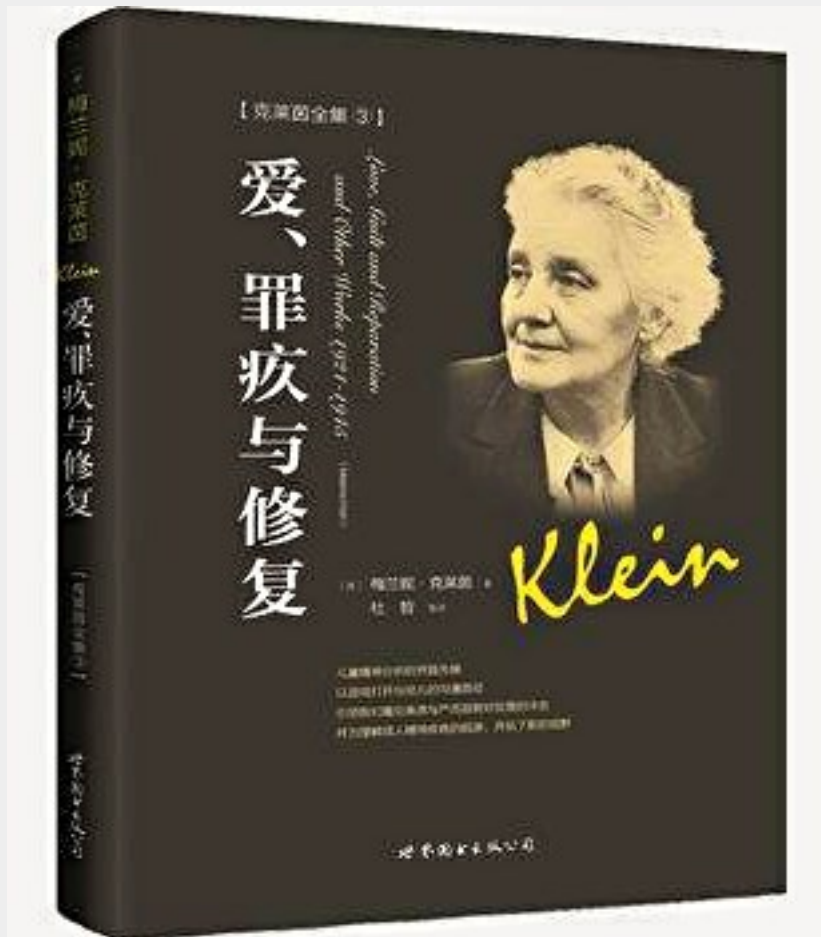
断进行的互动。



1952 同业学者与友人在伦敦的凯特纳庆祝梅兰妮·克莱茵 70 岁生日

这些以及许多其他的发现，随着她持续对儿童与成人的分析而逐步开展与丰富化，并且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架构。这一点随着 1935 年发表的《论躁郁状态的心理成因》（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Depressive States）而更为清楚，这篇文章综合上述许多观念，并加以系统化。现在，我们见到她比较不强调攻击性，而较强调生死本能、爱与恨之间的互动及其隐含的意义。她引介了“心理位置”的观念，并描述“抑郁心理位置”（depressive position）及其与“偏执心理位置”（paranoid position，当时如此称呼，后来名为“偏执—分裂心理位置”〔paranoid schizoid position〕）之关系。心理位置的观念意味着与较为僵化的发展阶段概念有所区别。克莱茵认为，每个心理位置具有其独特的焦虑与用来对抗这些焦虑的防御方式，而这些防御或是更偏向整合和更真实的客体关系，或是相反地，更偏向分裂（splitting）与碎裂化（fragmentation）。因此，她并不视这些心理位置为已经渡过且完成的阶段，而是个体人格中的动力部分。

这些想法在五年后的文章《哀悼及其与躁郁状态的关系》（Mourning and its Relation to Manic-Depressive States）中有进一步的发展，不过要等到 1946 年在《对某些分裂机制的论述》（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中，梅兰妮·克莱茵的基本理论架构才算得到最终阐明。在该篇文章中，她更巨细靡遗地探讨了生命最初几个月间的心理过程，即偏执—分裂心理位置，并且引介了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的概念：既是一种防御机制，也是一种侵入和控制客体的方式。她在这个领域的工作对于了解精神病具有很重要的贡献，这些在罗森费尔德（H. Rosenfeld）、西格尔（H. Segal）、比昂（W. Bion）等人的工作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57 年，克莱茵出版了最后一本重要著作《嫉羨与感恩》（Envy and Gratitude），在此作品中，先前曾在某些儿童案例中被描述为重要情绪的“嫉羨”，现在被视为正常与病态发展的要素。



《爱、罪疚与修复》

梅兰妮·克莱因 著 九州出版社 2014 年 10 月出版

虽然梅兰妮·克莱茵发展了新的理论架构，她始终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基本上奠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只是在一些方向上有所不同，这些歧异之处主要在于她相信：许多弗洛伊德的发现，事实上源于比他所认为更早的阶段。克莱茵的理论思想萌发于她在临床工作上很深的投入，其理论的发展也和临床工作并行。这种介于临床工作与理论思想之间的互动，对于许多欣赏并且重视其贡献的分析师而言，已被证实为非常有力的启示。■

[【返回目录】](#)

## 云豹沙龙 | 2018-2019 年度众筹

### 一. “云豹沙龙”简介

中评网/中评周刊作为网络媒体平台和学术-社会的沟通桥梁,每年都会就热点问题举办四、五期小型沙龙/研讨会,邀请对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热点问题展开客观理性的分析向社会公众介绍知识界的专业观点和深入交流。小型沙龙通常为期半天,主题涵盖经济、法律、文化、历史、国际事务等领域。曾举办的有代表性的沙龙诸如:

- 2011年3月,「**城市发展和公平正义**」研讨会,讨论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城市病”问题。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首经贸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刘业进等。
- 2012年3月,「**遏制部门立法 保护公平正义**」研讨会,聚焦于行政部门主导立法导致的部门本位问题。参会学者包括: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干帆、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田飞龙等。
- 2013年4月,「**铁路改制:问题、展望与出路**」研讨会,于铁道部改制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之际举办。参会学者包括: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荣朝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坚、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等。
- 2014年9月,「**邓小平与中国**」研讨会,于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举行。参会学者包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胡耀邦史料信息网负责人李胜平、著名历史学家章立凡、《炎黄春秋》总编辑吴思等。
- 2015年10月,「**股市行为与市场规则**」研讨会,讨论2015年股灾成因及教训。参会专家包括: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负责人田利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等。

### 二. 众筹方案

2018-2019年度,中评网/中评周刊将延续往年“云豹沙龙”年度系列沙龙活动。为此特向社会公众发起众筹,以筹集沙龙的组织资金。

#### 1. 众筹目标: 3万元 (2018-2019年度4-5场沙龙的总经费)

#### 2. 众筹资金将用于:

参会专家交通费和劳务费

会议场地、茶水费用  
会议专业速记费、摄影摄像成本  
会议资料编辑费  
会务组织劳务费

### 3. 众筹回报：

#### 1) 面向社会听众：

**支持 100 元：**可获得本年度系列沙龙中任选一期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400 元：**可获得当年五期沙龙的完整发言稿（发送至您的电子邮箱）；

**支持 800 元：**可获得本年度五期沙龙的听众入场券（以手机短信形式通知）。

#### 2) 面向内容合作方：

**支持 8 千元（每期沙龙仅一位）：**获得一期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拟定该期沙龙的议题；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的独家报道权；可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该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该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支持 3 万元（全年仅一位）：**获得全年系列沙龙的联合主办方冠名，可共同协商决定各期沙龙的选题；与中评网/中评周刊共享各期沙龙专家发言稿的同步首发权；可获得并使用各期沙龙的影像资料。

### 4. 社会听众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至北京中评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账号：**861581962310001（招商银行双榆树支行）**。  
汇款附言请注明“参与沙龙众筹”+您的姓名+您的手机号或您的电子邮箱。主办方核实款项后将通过您预留的联系方式与您联系。

### 5. 内容合作方联系方式：

内容合作方请洽陈女士商谈合作详情。

**联系方式：**[wistom113@163.com](mailto:wistom113@163.com), 13717696284。

### 6. 说明：

如因各种原因,2018-2019年度沙龙活动不足五期,则参与众筹者的权益将自然顺延至下一年度。  
感谢您的浏览! ■■

[【返回目录】](#)

中评周刊邮件订阅方式 | 读者来信: chinareview2000@gmail.com

电话联系方式: 13717696284 15011147717

微博: 云豹 ONE

您可以在以下地址下载往期中评周刊:

**Dropbox:**

[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https://www.dropbox.com/sh/7tsrbl4y32h3zrk/AAADCfzLgHHNe0Szy7_NQ3m_a?dl=0)

**Onedrive:**

<https://1drv.ms/f/s!AtpheKM9vX8Zaay8vB8f0joiCdo>

**百度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3nGIII-5ehNtyrlr9dKw> 密码: t9ed